晉奉涿州之戰（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及其影響

胡平生

前言

民國十五至十七年（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南北軍閥的聲勢已如強弩之末，惟其回光返照，餘熱猶炙；加以爭權奪利，黷武成習，彼此間的攻伐並未見沉寂。局處南方一隅的國民黨，則異軍突起，於民國十五年七月自廣州誓師北伐，進展甚爲迅速；遠赴蘇俄考察遊歷的馮玉祥，亦於是年九月返回國內，在綏遠西部的五原誓師，組建國民聯軍，並率領全軍加入國民黨，次第展開其固甘、援陝、圖豫的軍事行動；都使原來錯綜的政局更形複雜。在這兩三年中，戰事既多，益以當時武器的威力有限，遠遜於今日，而且當時中國各縣市多有深溝高壘堅固的城牆，傳統的忠「君」觀念仍深植人心，因而發生一些民國史上著名的守城之役，並不全然爲歷史的巧合，如蔣世傑之守信陽，劉汝明之守南口，李雲龍、楊懋（楊虎城）之守西安，劉玉春之守武昌，傅作義之守涿州；其中尤以涿州密邇北京，影響最大，最受矚目，以下即論述此一戰役的由來、經過、善後及其影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晉奉之開戰

民國成立以後，山西軍政大權長期掌握在督軍（原名都督）閻錫山手中。[①]閻字伯川，山西省五臺縣人，畢業於山西武備學堂及日本士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科），係同盟會會員；爲人極富心機，善於權謀，加以山西省的幅員和兵力有限，處於北洋軍閥勢力重重包圍之下，雖四周有山河峙帶，欲求自保，亦至爲不易。閻爲遷就現實免爲北洋勢力吞併起見，乃採依附北洋強權、保境安民的因應之道。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九月，孫中山應邀赴山西視察訪問時，對閻是否仍將效忠革命，已略有懷疑。[②] 次年，討袁二次革命發生，閻果然保持中立，在態度上已傾向於袁世凱。民國五年（一九一六），閻擁護洪憲帝制，並在是年五月舉行的南京會議中主張袁仍任大總統。袁世凱死後，閻又倒向繼袁掌政的段祺瑞，成爲皖系軍閥有力的奧援。民國九年（一九二〇）直皖戰後，段失勢退隱，閻即轉與直系軍閥首領曹錕、吳佩孚親近，直至十三年（一九二四）秋冬第二次直奉戰爭直系大敗段祺瑞出山任臨時執政，閻才再度擁段，並與新崛起的馮玉祥往還甚密。十五年（一九二六）春，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與東山再起的吳佩孚聯手出兵南北夾攻馮玉祥之國民軍，閻見馮通電下野，國民軍失卻領導重心，失敗已可預期，遂一變昔日親馮態度，加入奉直（吳）聯盟，堵截向西北一帶撤退的國民軍，於是國晉戰爭爆發，雙方在雁北地區激戰，國民軍終難敵奉、直、晉的合力進擊，戰敗退往寧夏、甘肅。

國晉戰爭結束後，晉軍勢力擴張至綏遠，又收編了一部分國民軍，一時聲勢頗壯。然而十五年九月，馮玉祥自蘇俄返抵國內在綏遠西部的五原舉行

---

① 清宣統三年九月初八日（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太原革命軍響應武昌起義，宣布獨立，推山西新軍第四十三混成協第八十六標標統閻錫山爲都督，不久，清軍大舉進攻山西，閻放棄太原，率軍北上，轉入綏遠。民國成立後，閻自綏遠返晉，民國元年三月十五日，袁世凱任命其爲山西都督，三年六月三十日，北京政府改都督爲將軍，五年七月六日，又改將軍爲督軍，閻均續任山西將軍、督軍。六年九月三日，閻又兼署山西省長，直至民國十六年。以上閻任山西都督、兼署省長日期，係參閱劉壽林編《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民國六十三年），頁三〇一～三〇八

② Donald Gillin, 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4—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9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專用章

誓師典禮，號召舊部，組建國民聯軍，自任總司令，並率領全軍加入中國國民黨，正式投效國民革命陣營。馮的再起，帶給閻極大的困惱。處於奉、國兩大勢力的中間，頓感左右爲難，爲了緩和馮率兵東進的企圖，閻交還被其收編的國民軍官兵，並撤回綏遠境內的晉軍。對於張作霖迭次催迫其協同進擊國民聯軍，則托辭保境安民延宕再三，惟爲表示與奉系的友好合作態度，隨於是年十一月三十日推戴張作霖爲安國軍總司令，③ 且不得已隨同奉軍進擊國民聯軍，將其逼退至甘肅境內，並在十二月二十日就任安國軍副司令。

同時，閻錫山因奉系迭相脅迫，又見國民革命軍北伐先頭部隊已越過長江，有聯合馮玉祥國民聯軍北上之勢，乃思拉攏國民黨。據閻自稱，早在民國十年時，孫中山就曾寫信給他，教山西在北方多負些責任，並說保境安民的政策，絕不是救中國的辦法，也絕不是救一部分的辦法。閻回覆孫中山，表示目下中國全部，完全是軍閥和軍閥的戰爭，山西即使參加了，也無補於國家的，若要山西參加，總得革命到了兩個重要時期，其一，如山西加入，革命就能成功的時期；其二、山西不加入，革命就要失敗的時期。④ 其一貫遷就現實的投機心態，由此可見。十五年十一月，閻錫山的代表溫壽泉、潘大初等，已開始透過關係與國民黨接洽，閻並電囑溫壽泉轉達「與黨軍同行」的決心。十二月一日，閻所派之代表趙戴文抵達南昌，謁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陳述山西加入國民革命軍的意願，雙方並約定國民革命軍入豫或至津浦路時，山西起而響應。⑤ 十六年（一九二七）一月三十一日，蔣中山提請國民政府任命閻錫山爲國民革命軍北路總司令，二月，奉軍準備進攻河南，河南之吳佩孚舊部靳雲鶚等通電拒絕奉軍入豫，國民革命軍西路軍亦集中京漢路正線待發，馮玉祥亦定於二月杪占領洛陽前進，於是蔣中正急電閻錫山，促閻之北路軍與馮之西北軍（即國民聯軍）共同一致於二月杪開始行動，襲擊京漢路奉軍之後或占領北京。⑥ 由於傳送延誤或其他原因，閻

③ 《時報》，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三日。

④ 此爲閻民國十七年二月六日在太原出席國民黨山西省黨部舉行之第六次總理紀念週時所作軍事報告之部分內容；見《申報》，民國十七年二月十九日，第九版。

⑤ 毛思誠主編、陳布雷校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民國二十五年初版，香港，龍門書店影印，一九六五年），頁一〇三三，一〇五四。

⑥ 〈漢口趙芷青方密八日電〉，國史館藏《閻故資政錫山遺存檔案（以下簡稱《閻檔》）—北伐北方軍參戰案（以下簡稱參戰案）》，卷一，頁四。

錫山至三月中旬才收悉此一間接轉來的電報，即於三月十五日密電山西駐武昌代表孔庚等，囑其轉達蔣中正「此間已預備好，一俟西北軍發動，當即一致動作。」⑦ 三月二十七日，閻始收悉其駐漢口代表趙丕廉三月七、八日拍發的密電，轉達蔣中正促馮玉祥、閻錫山出兵，務於三月二十日（哿日）前後到達京漢線，協同進攻，使敵人首尾不能相救的企盼之意。⑧ 同時，國民政府（在武漢）爲籠絡閻，特任其爲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⑨ 三月二十九日，趙丕廉密電閻氏：

> 前電屢請哿日前後發動，一未得復，至爲焦慮。現在滬寧克復，津浦路發展至速，鄭州得而復失，京漢路發展較遲，我方已否發動，至念。竊以時至無可再緩，倘馮方一時不主急進，我亦宜先通電就職，實行政治工作，兵事不妨暫取守勢，靜待時機，可否，酌裁。⑩

閻仍然猶豫不決，並未就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職，但因見國民革命軍進展順利，已於三月二十二、三日攻占上海、南京，掩有華中、華南八、九省，吳佩孚、孫傳芳兩大軍閥相繼失敗逃遁，北伐情勢大好，乃於四月一日宣布廢除「督辦」名義，改稱「晉綏軍總司令」，將所部改編爲晉綏軍。⑪ 並於四月五日下動員令，向山西省民宣布服從三民主義。⑫

山西動員令下達後，武漢方面認爲此舉關係全局至爲重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遂擬定消滅奉軍計畫：㈠ 令唐生智速率六軍向鄭州北進，四月十八日（巧日）動員，五月五日至十一日總攻擊。㈡ 電令馮玉祥軍西進，由河南省之孟津渡黃河，同時占領豫北，截斷奉軍歸路。令閻錫山軍同時以重兵占領直隸省西部之石家莊，又截斷其歸路，另以一支軍隊進占涿州，堵截

---

⑦ 〈復武昌孔文掀、王介丞方密銑電〉，同上，卷一，頁二。
⑧ 〈漢口趙芷青方密七日電〉及〈漢口趙芷青方密八日電〉，同上，卷一，頁四～五。
⑨ 〈漢口趙芷青方密寒電（民國十六年三月十四日），《閻檔—參戰案》，卷一，頁六。
⑩ 〈漢口趙芷青方密廿九日電〉（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到），同上，卷一，頁九。
⑪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七年）㈡，頁七四一。
⑫ 〈致漢口趙芷青方密微電〉（十六年四月五日發），《閻檔——參戰案》，卷一，頁一三。

北京附近之奉軍南下。各方總攻擊，皆在五月五日至十日。京綏路晉軍則相機占領北京、天津，又截斷其歸路。鄭州下後，唐生智、靳雲鶚率軍沿隴海路進向徐州，轉由津浦路進向濟南、天津，使奉軍悉被包圍，處處被截斷，不得不退出關外，只有向東潰退。⑬ 此一計劃，係由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嘉倫（Gallen Blyukher，亦譯作加倫）同軍事委員會所擬定，嘉倫並面告閻錫山駐漢口代表趙丕廉，謂此一計劃確有把握，他可擔保。⑭ 然而此一三方同時出兵消滅奉軍的計劃，卻因馮玉祥別有用心，想乘機侵占綏遠引致閻錫山的不滿而生波折。四月二十六日，閻接馮玉祥密電，馮謂刻接其駐漢口代表劉驥電告國民政府之作戰方略，閻軍應向石家莊出擊，以截斷京漢奉軍歸路。馮軍應以主力經石家莊向東北，以天津爲目標；包頭一部應以北京爲目標，沿京綏路向東進。⑮ 爲此閻大爲憤慨，認爲約一個月前，曾接所部將領綏遠都統商震電告，謂突有馮部國民聯軍四、五千人已抵五原西之臨河，經交涉再三，馮始稱已令其寧夏軍隊（宋哲元部）分期向西安、潼關間集中，不再由綏遠東進。然未及匝月，忽又有上項事情發生。五月一日，閻密電駐漢口代表趙丕廉，謂「政府果有劉（驥）電所述丁款方略，恐係未審此間與煥章（按：馮玉祥字煥章）近來商訂情形，希設法制止其動作，並請政府更正方略爲要」。⑯ 同日，閻密電商震，認爲「政府有此種方略尙未可知，然馮氏侵占綏遠之意則昭然若揭」，並告知商震，已於同日電覆馮玉祥，促其「飭部力踐前約，免致有碍進行也」。⑰

由於閻錫山反應激烈，加以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亦致電勸馮，馮玉祥乃於五月十四日密電閻有所解釋，謂「五原分兵純係土匪石海所爲，冒竊名義」，馮部駐寧夏之第八師、第二十五師，已開赴平涼、涇川待命。對於京綏路出兵一事，如非得閻同意商妥，此間決不至有出兵動作。⑱ 五月十六日，閻接到馮電，即於當天致電馮，謂「吾兄顧念大局，堅守前約，至深紉

⑬ 〈漢口趙芷青方密（四月）十五日電〉，同上，頁二〇。
⑭ 〈漢口趙芷青方密號電〉（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到），同上，頁二一。
⑮ 〈西安馮總司令成密有亥電〉（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到），《閻檔——參戰案》，卷一，頁二六。
⑯ 〈致漢口趙芷青方密東電〉，同上，頁三〇～三一。
⑰ 〈致歸化商都統啓密東二秘電〉，同上，頁三二～三三。
⑱ 〈潼關馮總司令成密寒電〉（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到），《閻檔——參戰案》，卷一，頁四六～四七。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佩」;「此間布置久已完妥，一俟貴軍大部集中鞏洛一帶，定當如約一致發動」。⑲ 六月一日，馮玉祥所部在河南擊敗奉軍，與唐生智所部會師於鄭州；南京國民政府之北伐軍，則擊退孫傳芳、鄭俊彥所部，占領江蘇北部之高郵，次日，占領徐州。閻錫山見國民革命軍在京漢、津浦兩路均有進展，遂於六月三日下令山西、綏遠一律懸掛青天白日旗，六月六日，閻在太原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正式加入國民革命陣營。太原街頭於是旗海（青天白日黨旗、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飄揚，並出現各種各樣的宣傳標語，如「繼續北伐，完成革命」、「排斥英日帝國主義」、「三民主義爲唯一之救國主義」、「反對三民主義者是革命之賊」、「擁護南京政府」、「擁護北方國民革命軍」、「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劣豪土紳」、「反對日本出兵山東」，其中反對共產黨的有「剷除黨內腐敗分子」、「打倒榨取勞動者之共產黨」、「打倒欺騙無產階級之共產黨」、「打倒破壞國民革命之共產黨」、「打倒篡奪國民黨權之共產黨」、「打倒企圖消滅中國國民黨之共產黨」,⑳ 情勢景象爲之丕變。惟閻錫山、張作霖間仍未決裂。

張作霖方面，自從其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在天津就任安國軍總司令後，即分兵南下；其直魯聯軍沿津浦路擴展到江南，奉軍主力沿京漢路進占了河南。十六年春，奉系的勢力擴張達於頂峰。然而好景不長，直魯聯軍在江南敗北，奉軍在河南受挫，奉系的處境岌岌可危，軍事上也由積極性的攻擊轉爲消極性的防禦。「南北妥協」、「共同反赤」的聲浪因之而起。主張南北妥協的爲一些奉軍新派將領，如奉軍總參謀長楊宇霆、第三軍團軍團長張學良，楊宇霆曾多次與閻錫山駐北京代表李慶芳接洽，商談「由三民主義解決國事」的具體途徑，張學良則致函閻錫山，表示「贊成三民主義」，請閻向寧（南京）方斡旋。㉑ 甫行易幟的閻錫山對於此事反應甚爲熱切，願意居間協調，有所促成。閻爲何如此熱衷？究其原因，約有如下數端：其一、閻並無與奉系開戰的決心，保境安民仍爲其一貫主張，如能促成奉寧妥協，不僅

⑲ 〈致潼關馮司令成密諫電〉（十六年五月十六日發），同上，頁四五。

⑳ 園田次郎〈山西の閻錫山氏と語る〉，《支那》十八卷八號（一九二七年八月），頁一一三。爲園田氏當時在太原身歷其境之記述。

㉑ 以上係參見習五一〈論安國軍政府的成立〉，《北京社會科學》，一九八八年四期，頁一三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戰禍可以避免，晉方來自奉方迭相逼迫的壓力也將大爲減輕。其二、閻反共甚力，對於寧漢分裂（民國十六年四月至八月）南京國民政府的反共支持甚力，對於武漢國民政府仍然容共感到憂心，五月六日，閻致電其在北京的代表溫壽泉，謂「武漢不倒，南京必失敗，時期愈延長，愈危險，武漢倒後，中國之腐敗軍閥，必不足爲國民黨之敵手也。應排除一切，專對武漢。」[22]如能促成奉寧妥協，可使南京集中軍力專事對付武漢，甚至奉、寧、晉合力，當可輕易推倒武漢國民政府。其三、閻一向善於精打細算，把斡旋奉寧妥協當作其重要的政治籌碼，此舉不但能凸顯晉閻的重要性，提高其地位，且將來如能形成奉、寧、晉三角聯盟，當可使馮玉祥在北方成爲無足輕重的人物，閻對馮一向是不大信任的。於是閻錫山派山西省政務廳長兼警察廳長南桂馨爲代表，於六月八日抵達北京，與奉方晤商

然而奉寧妥協的協商進行並不順利，主要的原因一爲奉系舊派將領如黑龍江督辦吳俊陞、吉林督辦張作相等人的反對妥協，主張勝則保全現有地盤，敗則退回關外。六月七日晚，張作霖開軍事會議，通霄達旦，會中舊派將領拍案大罵，翻桌倒椅，使張左右爲難，無所適從。[23] 二爲晉方代寧方提出的條件除贊同三民主義外，尚有懸掛青天白日旗及改稱國民革命軍。張作霖則祇強調「共同討赤」，對三民主義雖不排斥，但易幟一事則極端反對，六月八日，張作霖與日本記者談話，對南京之蔣中正是否眞正反共表示懷疑，並認爲青天白日旗乃國際主義招牌，奉方絕對不用。至於改編爲國民革命軍，更無其可能。六月十一日，直魯聯軍將領山東督辦張宗昌、失敗後走依奉系的孫傳芳聯袂抵北京，與奉方要人連日會商，二人意氣激昂，聲言願與奉、直魯聯軍共生死，極力主戰，奉晉寧妥協運動遂爲之一頓。[24] 晉方代表南桂馨乃取消由北京赴南京的計畫，遄返太原。六月十八日，張作霖在北京就任陸海軍大元帥。六月二十日，蔣中正等寧方之要人與馮玉祥在徐州開會，次日，蔣馮聯電聲明繼續北伐，爲三民主義奮鬥，完成國民革命，並由

㉒ 《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㈡，頁七四六。

㉓ 孟湘鑑〈北方政情——民國十六年七月二日向武漢中央之報告〉，見蔣永敬編《北伐時期的政治史料》（台北，正中書局，民七十年），頁一一七。

㉔ 《北京益世報》，民國十六年九月四日，第六版，〈本報休刊期中大事記〉中關於奉晉寧妥協運動之記述。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馮致電武漢方面促鮑羅廷（Michael M. Borodin）回國，請汪兆銘（汪精衛）、譚延闓速決大計，並請唐生智將所部調回鄭州，協力北伐。馮玉祥之表明立場，與寧方合作，使奉系大爲恐慌，加以寧方之北伐軍已進至山東南部，迭敗直魯聯軍，於六月二十三日進圍臨沂，情勢對奉方極爲不利，而且晉閻的態度如何？也是奉方極度關切的。於是妥協之議又起。六月二十八日，張作霖致電閻錫山，提出「非停戰不可以救民，非議和不足以殲赤」的呼籲。並派北京衛戍司令邢士廉爲代表，於是日前往太原見閻，再謀奉晉寧之妥協。㉕ 閻因患胃病未予接見，由其總參議趙戴文等人接待，並代轉閻對時局的兩點意見：其一、願奉方誠意聯蔣，並要趕快。其二、北京政治應照三民主義範圍內，切實去做。換言之，即應從易幟更名做起。㉖ 仍係舊話重提，了無新意。七月三日，邢士廉返回北京，所謂妥協運動，又爲之一頓。

七月八日，馮玉祥所部攻占河南省東部之衛輝，黃河以北的奉軍，以閻錫山北方軍之脅迫及馮軍之進攻，急遽後退，悉抵直隸省之正定。七月十日，馮玉祥之代表劉治洲由晉回豫，閻、馮關係漸好。七月十二日，寧方之北伐軍越過山東省之臨城，迫近滕縣。七月十四日，馮軍占領河南省之彰德。閻錫山見奉軍、直魯軍日漸窮蹙，遂令晉軍出動，於七月十六日（銑日）占領直隸省西境的石家莊及順德。㉗ 惟此時閻仍不願與奉方開戰，向奉方解釋此次行動爲「貴軍自退，我軍不得不接防」。㉘ 且晉方代表南桂馨偕同寧方駐晉代表何澄，已於七月十五日抵北京，一時妥協空氣，又陡濃厚。而奉寧直接接洽的局面，亦即由此肇始。南桂馨在北京曾與奉方新派將領韓麟春、楊宇霆等晤談，楊宇霆談話雖多，歸納其意不外「政治從詳研究，軍事須相合作」而已。㉙ 何澄則對奉方「先軍事而後政治」的主張甚不以爲然，認爲政治尤應先於軍事，「南方政治有如股份公司，北方若不自動有根本的刷新表示，足以迎合時代思潮，則南方實無法向民衆交代而與奉方攜

㉕ 《大公報（天津）》，民國十六年七月八日，第二版，〈邢士廉談赴晉始末〉。
㉖ 同㉔。
㉗ 〈復南京劉樸忱里密箇電〉（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發），《閻檔——參戰案》，卷一，頁八五。
㉘ 《大公報（天津）》，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第二版，〈妥協運動之研討〉。
㉙ 《北京益世報》，民國十六年九月五日，第六版，〈本報休刊期中大事記〉。

手」，「以奉方現狀，欲與寧晉合作討赤，直不可能」。㉚

七月十九日，津浦路方面直魯軍褚玉璞、徐源泉、許琨等，乘北伐軍第四十軍（軍長賀耀祖）南撤，再度反攻，復占山東之臨城。七月二十三日，直魯軍越過韓莊，次日，攻占徐州。張作霖見直魯軍反撲得逞，亦思有所行動。七月下旬，閻錫山接大同方面報告，謂奉方已派穆春爲張垣至柴溝堡總指揮，于珍爲豐鎮至平地泉總指揮，于已於七月二十四日由平地泉赴豐鎮，不日即向晉軍開始攻擊。閻即於七月二十七日密電晉方駐北京代表李慶芳，告以奉方「此種動作，顯係對我預備攻擊，希轉知各代表注意爲要」。㉛ 七月二十九日，閻密電蔣中正，略云：「接報，奉軍以主力向京綏路取攻勢，此間擬由京漢路直撲天津，以期一了百了，津浦線戰況如何，盼示」。㉜ 八月三日，北伐軍反攻徐州不成，大舉南撤。八月八日，武漢方面分共，但汪兆銘、唐生智仍欲「東征」，推倒蔣中正，寧方將領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亦不滿蔣，不再支持蔣，馮玉祥也逼蔣表態，要其與漢方進行合作。㉝ 在種種壓力下，蔣於八月十二日通電辭職，離南京赴上海。同日，孫傳芳部攻占淮陰，八月十六日，占揚州，次日，直魯軍及孫傳芳軍抵浦口，與國民革命軍隔江相峙，互相砲擊，北伐情勢急轉直下。八月二十一日，張宗昌抵北京，謁見張作霖，商承大計，次日，張宗昌即密電閻錫山，切盼閻「仍本休戚相關始終不渝之旨，協力討馮，尅日出兵」，並且「因時制宜，當機立斷，撤卸黨旗，對中央同取一致態度，以資團結，而利事功」，要閻將晉方占領之直隸省所屬各縣區交還奉方，「俾於行政及防務一切界限分明，辦事上減除困難，而雙方軍民感情亦可日見融洽，實屬兩有裨益」，奉方並擬派李玉麟、唐在禮、常運衡三人前赴太原宣達上述各項旨意。㉞ 然而此舉反促成馮、閻合作反奉。八月二十八日，馮玉祥密電閻、情詞懇切，溢於言表，略云：

㉚ 同㉘。

㉛ 〈致北京李芬圃端密沁電〉（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發），《閻檔——參戰案》，卷一，頁八九。

㉜ 〈上南京蔣總司令里密艷電〉（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發），同上，頁九一。

㉝ 參見張學繼〈一九二七年蔣介石下野的原因〉一文，載《近代史研究》，一九九一年六期，頁一八三～二〇〇。

㉞ 〈北京張效帥安密禡子電〉（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到），《閻檔——參戰案》，卷一，頁一〇四～一〇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前次雪竹（按：何成濬字雪竹）兄兩度過京，京津間盛傳奉寧晉同盟之說，此種挑撥離間之宣傳固不值識者一笑。今雪竹南返，事雖大白，乃昨據津城探報，近復揑造弟（按：馮自稱）請張宗昌、孫傳芳一致討晉之電，遣使赴晉，誘迫我兄，撤旗易幟，挾制晉軍，讓防石莊。方今我南方武裝同志不暇北顧之際，奠定燕京，端賴我兄，所有隸屬國民革命旗屬下之軍隊，悉爲此共同目的而使用，安有彼此之分？此間諸軍，追隨鞍鐙，祇知急難之誼，苟有圖晉之心，豈復人類？茲特再派劉君治洲入晉，面商進行之策，俾竟國民革命之功。㉟

八月二十九日，晉方在北京之代表李慶芳、南桂馨啓行回晉，奉晉關係急激惡化。㊱

八月三十日，龍潭之戰結束，寧方軍隊大敗孫傳芳軍於南京城外，孫軍陸續向江北潰退。九月四日，閻錫山與馮玉祥約定：由晉軍擔任京漢、京綏兩路，馮軍擔任津浦路方面，自定約後，馮軍應於三星期內攻取徐州，並以大部分兵力進攻山東之德州，掩護晉軍右側，北方軍俟馮軍攻克徐州進攻濟南，或以大部進迫德州時，即由京漢、京綏兩路猛迫京、津。惟定約後，閻連接探報，謂奉方迭次會議，決定大舉進攻河南，閻爲牽制奉軍南下起見，不得不先期發動。㊲

閻錫山一向小心謹慎，素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保境安民的原則，此次竟然採取主動，決定大舉進擊奉軍，頗出一般意料之外。揆其發動晉奉戰爭的原因，約有下列數端：其一、閻早年爲同盟會會員、國民黨黨員，近又高揭黨幟加入國民革命軍，依照新舊性質極端相反的原則，則晉奉當再無合作之餘地。閻初尚寄望於奉晉寧妥協共同討赤，然後來漢方反共、寧漢和好，無赤可討，加以奉方堅決反對易幟及軍隊之改編，妥協之說徹底失敗。而奉

㉟ 電文見《盛京時報》，民國十六年九月三日，第四版。
㊱ 同上。
㊲ 〈復南京李協和川密東電〉（十六年十月一日發），《閻檔——參戰案》，卷二，頁一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對於晉方代表之應付圓滑、措辭巧妙，常有哭笑不得之雅，奉方幹部中人提及晉省態度，直謂「比明白宣戰，猶爲可恨」。[38] 閻深知晉奉終必決裂，與其坐待奉方來攻，不如捷足先登、先發制人之爲得。其二、就現實利益而言，奉方急欲說動晉閻，合攻河南，解決其多年仇怨之馮（玉祥）軍。晉方則以爲縱與奉方合作，成功以後，孤立無援之山西，必爲奉方勢力所蹂躪，以是不獨無意與奉方合作，且欲策將來山西之安全，當以聯合馮玉祥共同拒奉爲得計，故閻探知奉軍將大舉進攻河南，爲牽制其南下，乃決定發動對奉作戰。其三、年來奉方對晉，雖亦信使往還，聲言和好，然自民國十六年春間以來，由天津轉晉之軍械及鐵器等，屢被當地官廳所扣留。天津在地理上爲北方對外之咽喉，而貨物運輸，尤與山西有深切關係，奉方一行此策，不啻宣布晉省之死刑，商家與人民等所感受的痛苦尚小，對當局的影響實大，不但直接由外購運械彈完全絕望，即鋼鐵材料、汽油等項，亦中斷來源，若常此以往，閻錫山數年來費盡心血所經營的兵工廠，勢將倒閉不可。故關鍵所繫，命脈攸關，閻豈能甘心，坐視其發生？其四、晉省民氣，近以革命潮流之激盪，遠非前多年不管閒事者可比，加以晉軍將領商震、徐永昌等，均非自甘落伍之人，對奉早有準備，閻既以民氣可用，又以將士齊心，故樂得而運用之。其五、山西近自擴張軍備以來，每年收支早已不敷，在無事之時，每年收支相抵，已非虧空五、六百萬元不可，若遇臨時有事，其臨時軍費之支出，更無論矣。山西此時若不乘機另覓出路，則金融一項已足陷於無可如何之境地。換言之，即進或有可爲，守則不啻坐而待斃，此當爲晉奉開戰的要因之一。[39] 其六、奉方內部不統一，嫡系與旁系之傾軋，新舊兩派之內訌，新派之間，亦有暗鬥。要之，自張作霖就任陸海軍大元帥以來，奉派分子異常複雜，關係亦益混亂。此外，奉日關係之惡化，如日前奉天有排日大遊行，這些都使沈機觀變之晉閻認爲有機可趁，敢於對奉開戰。[40]

民國十六年九月下旬，閻錫山先令其左路軍總指揮商震，將左路各軍於

㊳ 《大公報（天津）》，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二版。
㊴ 同上，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四日，第三版。
㊵ 《盛京時報》，民國十六年十月五日，第一版。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九月二十九日以前佈署完畢，以第一軍在大同，第九軍在平地泉，第七軍在天鎮、陽高附近。商震復將所部加以區分，計爲「挺進騎兵隊」、「前敵軍」、「左翼隊」、「獨立騎兵隊」、「騎兵別動隊」、「總預備隊」等。九月二十八日，前敵軍指揮張蔭梧以豐鎮扼京綏鐵路交通，乘夜急擊之。時左翼隊與奉軍激戰於卓資山，經夾擊後，奉軍始退，是爲豐鎮戰役。九月二十九日，晉軍之左路軍先後攻占豐鎮及平地泉。前敵軍第五師在永嘉堡集結時，柴溝堡方面之奉軍時來襲擊，晉軍遂在閻家溝、瓦溝臺之線作防禦工事，嚴整守備。殆豐鎮之部隊來到後，始開始進攻，十月一日，稍有進步，十月三日，始將柴溝堡占領，奉軍紛向張家口退卻，是爲柴溝堡戰役。前敵軍第十五師自天鎮出發，向懷安方面前進，十月二日，開始攻擊，奉軍向舊懷安方面潰退，十月四日，又向宣化方面潰退，是爲懷安戰役。十月五日，協同第五師及左翼隊占領張家口、萬全、宣化一帶地區。左路軍總指揮商震則率總預備隊於十月一日抵達大同，十月五日，商震於占領張家口後，復令第十五師跟蹤追擊奉軍，第五師繼之，總預備隊經下花園、懷來向南口進攻，另以左翼隊經懷來、延慶攻南口之東側，騎兵第三師經此路線，至懷來後，改向東進，以掩護本軍之左側。十月六日，第十五師與奉軍遭遇於宣化城東，七日拂曉，第十五師向奉軍正面突施攻擊，同時，第五師亦攻奉軍右側，相持鏖戰，奉軍援隊大至，向晉軍猛襲三次，正面陣線動搖，賴第五師之一部來援，會同死守陣地，彈如驟雨，官兵傷亡慘重，終以守禦堅強，奉軍始退回原陣地。是日之戰，第十五師傷亡人數，竟達全師三分之一，其戰鬥之烈可知。相持至十月十三日，晉軍恐師老受損，遂全軍變更作戰計劃，左路軍亦從別方面轉進。京綏路上第一回合之戰事，即以此下花園一役而止。[41]

晉軍京漢路之右路軍方面，由閻錫山親自指揮，其主力沿鐵路西側，以楊愛源之第二軍，徐永昌之第三軍並列，協同北展。一部沿鐵路東側，以掩護主力右翼之安全，由李維新之騎兵第十軍任之，並以傅存懷之第四軍爲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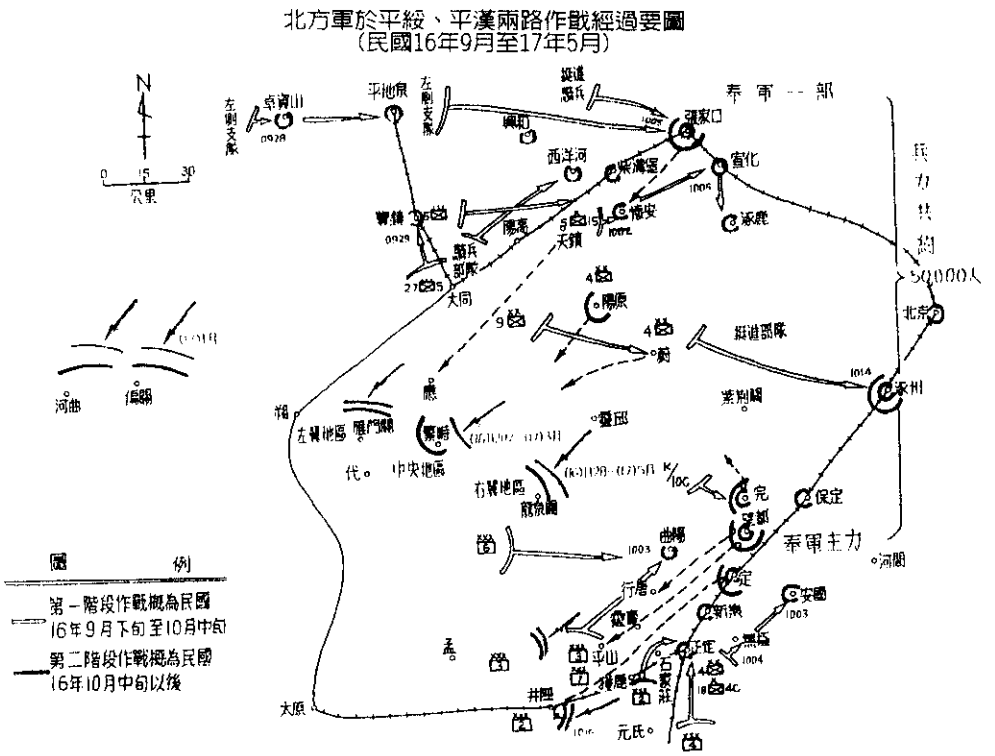
[41] 以上各戰役經過係參見文公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記》（上海，新光書局，民國十八年），頁一五三～一五七；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第二輯（台北，國防部印製廠重印，民國四十一年），卷三，頁二三七～二四六；國防部史政局《北伐戰史》（台北，撰者及中華大典編印會合作出版，民國五十六年），頁九四四～九五三。

預備隊。民國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二、三兩軍由獲鹿、石家莊、平山、井陘一帶出發。九月三十日上午，第二軍占領滹沱河北韓家樓、曲陽、平邱之線，下午破壞正定以北辛安車站附近之鐵路。十月一日，將正定奉軍擊潰，而占領正定縣城，是爲正定戰役。奉軍敗退後，復於新樂城之北養馬一線構築堅固陣地。十月四日，第二、三兩軍逼近沙河北岸奉軍陣地，五日拂曉前開始進攻，當日午後六時，將奉軍全陣線突破而占領之，乘勝尾追，遂克定縣縣城，第十軍之騎兵旅復占安國縣城、第六軍亦將曲陽之奉軍驅走，會同第四軍向方順橋進攻，是爲新樂戰役。右路軍於十月五日攻占新樂城附近奉軍陣地後，當即分途向保定方面追擊，奉軍在望都附近設防力抗，並調大部兵力增援，於是雙方遭遇，發生望都會戰。十月五日，閻錫山進駐京漢路之東長壽車站，當晚接攻占奉軍陣地占領定縣、安國之各方報告，即令第十軍速向板橋鎮方面進出保定東北，截斷奉軍歸路，令第四、第六聯合軍向保定前進，第三軍爲支援隊；第二軍爲預備隊，第二軍以一師開往望都，主力在定縣附近。十月六日，第三軍之別動隊赴安國方面活動，其餘沿京漢路向東北攻擊前進。六日下午與奉軍遇於清風店東北，擊退之。奉軍復集結大部反攻，第二軍遂以一部來援。至十月七日，奉軍復漸退至望都一帶。是日，第四軍之第十師攻占楊城村，第四、第六聯合軍追擊至唐縣。十月八日，望都附近之晉軍繼續向奉軍猛攻，第四、第六聯合軍方面以奉軍兵力雄厚，衆寡懸殊無進展，與右翼第三、第四兩軍之連絡被奉軍突破，不得已向唐縣退卻，其左翼郭莊東高昌一帶，亦被奉軍包圍，經第八軍奮力作戰，始擊退之。十月九日晨，第四、六聯合軍之右翼進至白嶽附近，始得與第三軍聯絡，而第三軍正面自十月八日夜間起，屢遭奉軍猛烈之攻擊，損失較重，定縣方面的晉軍右路軍第十師（屬第四軍，缺第十八旅），於十月九日進至該縣西南之二十里鋪附近，與大部奉軍遭遇，形勢緊急異常，閻錫山急調衛隊旅馳援。十月十日，望都之奉軍反攻甚烈，第十師不敵，退至王家營，奉軍進入清風店，定縣、望都方面之奉軍均愈迫愈緊，閻不欲作無益之犧牲，遂令各軍分別轉進晉、燕邊境山嶺地帶，暫行依山防守，以待後圖，京漢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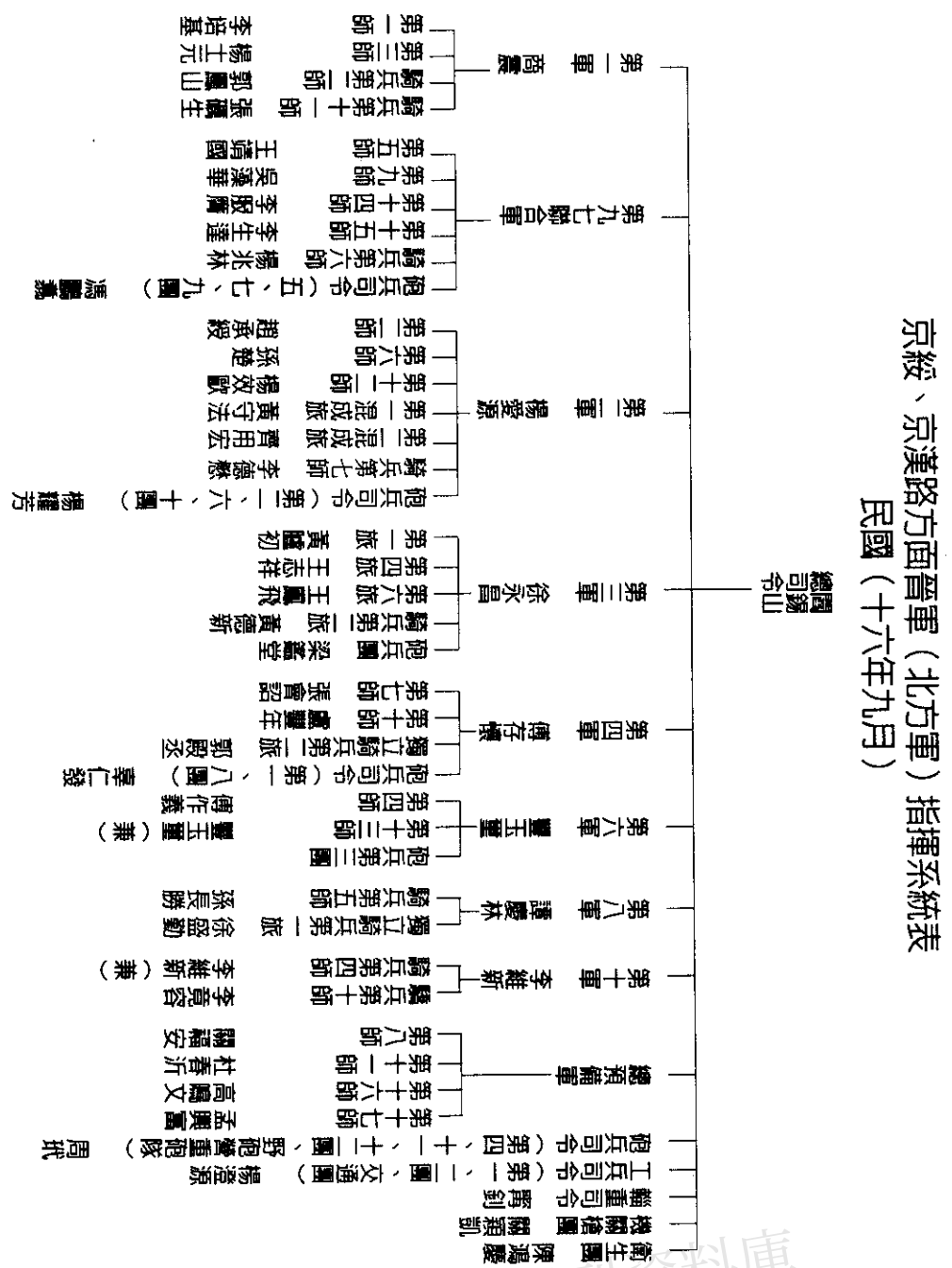
方面的戰鬥，亦暫告停止。㊷

茲將晉軍（北方軍）於京（平）綏、京（平）漢兩路作戰經過要圖及京綏、京漢路方面晉、奉軍指揮系統表轉錄於下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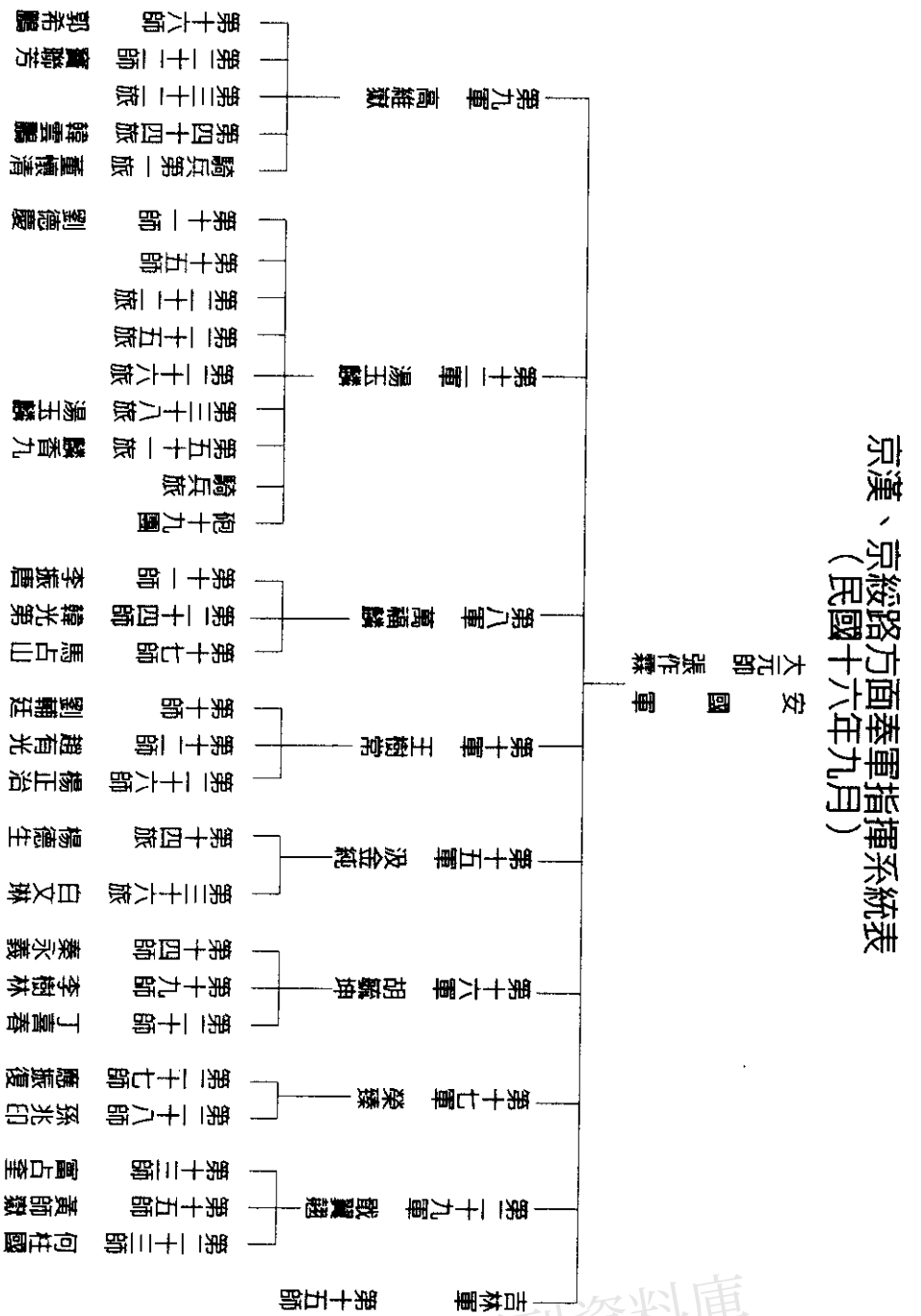
㊷ 《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記》，頁一五七～一六〇；《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第二輯，卷三，頁二四六～二五七；《北伐戰史》，頁九三三～九四四。

㊸ 錄自林培植主編、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二部：北伐》（台北，編纂者印行，民國八十二年）下冊，頁一三，插表三；頁一四，插表四；及第四篇第四章第三節第二款，插圖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京漢、京綏路方面奉軍指揮系統表
（民國十六年九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傅作義之襲占涿州

傅作義是晉軍傑出的青年將校，字宜生，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出生於山西省榮河縣之安昌村。[44] 十六歲時（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考入太原之山西陸軍小學堂第五期就讀，同期同學有續範亭、朵珍、楊維漢、楊耀芳、賈鉞等人。[45] 入學後不久，即暗中接受革命思想，並且首先剃掉了辮子。[46] 宣統三年九月初八日（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山西革命黨人在太原舉事，響應武昌起義，陸小全體學生參與此次行動，傅且擔任學生軍排長，維持市內秩序。次日，學生軍隨姚以價（山西民軍東路司令）開赴娘子關，抵禦清軍，在娘子關戰鬥中，傅奮勇殺敵，受到姚的表揚。清軍攻入娘子軍，山西民軍潰退。傅聞山西軍政府副都督溫壽泉率敢死隊南下，遂偕同薛篤弼、張履泰、郭忠等，追踪至運城。適李鳴鳳（岐山）率河東民軍攻打臨汾，傅乃以參謀職務參與攻城部署和作戰。[47]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傅作義自山西陸軍小學畢業，即保送至北京附近清河鎮之陸軍第一中學（亦名第一陸軍預備學校）第三期就讀。民國四年畢業，經過考試，進入保定之陸軍軍官學校第五期步兵科就讀，至民國七年（一九一八）畢業。[48] 同期同學中日後較爲知名的有楚溪春、張蔭梧、胡毓坤、董英斌、富雙英、趙承綬、王靖國、李服膺、李生達等人。[49]

傅作義自保定軍校畢業後，即偕同趙承綬、李服膺等返回太原，山西督軍閻錫山派他至晉軍獨立步兵第十團（團長蔡榮壽）任見習官。次年（民國八年），升任排長。二十七天之後，升任營附。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升任

---

[44] 安昌村在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改隸於臨猗縣，故有人說傅作義是山西臨猗人，見蔣曙晨《傅作義傳略》（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一。

[45] 榮鴻臚、李志與〈太原解放前山西歷屆軍事學校概況〉，《山西文史資料》第五輯（太原，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頁一〇四。

[46] 此爲傅作義晚年之憶述，見氏著〈眞正信仰中山先生的人必須服從人民的願望〉，《光明日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二版。

[47] 田際康、張友、史新民〈傅作義生平簡述〉，《山西文史資料》四十四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頁一三七。

[48] 同上。

[49] 見河北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保定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三七三～四〇二。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第四團（團長謝濂）第一營營長。次年，任第四團團附。十三年（一九二四），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傅奉命擔任石家莊市警備任務，因功升任第四旅（旅長謝濂）第八團團長。次年，樊鍾秀率豫軍進攻山西遼縣，傅奉命由原平率第八團官兵，馳赴前線作戰，以奇兵繞道插入樊軍後方，襲擊樊之司令部，致豫軍大潰。十五年（一九二六），國（國民軍）晉戰爭爆發，馮玉祥所部國民軍進攻雁北，晉軍受挫，退守雁門關。傅奉命留守天鎮。[50] 天鎮在山西省之東北部，位於京綏鐵路線上，西距陽高約五十三華里，東北距張家口約一百七十五華里，周圍有城牆，高三丈五尺。[51] 四月一日，傅作義率部進駐天鎮縣城。以一團之兵力，抵禦三倍於己的國民軍，歷時三個多月，其間雁北十餘縣，除大同、天鎮之外，悉爲國民軍所攻占，惟晉軍用釘釘子的辦法留傅作義部死守天鎮，卻極爲成功。傅克盡職守，配合大同之晉軍，對牽制國民軍使其不能集中全力進攻雁門關，起了一定之作用。[52] 傅的傑出表現，使他在晉軍中聲譽鵲起，閻錫山傳令嘉獎之，擢升爲第四旅旅長。[53] 同年八月下旬，傅的直屬長官第四師師長謝濂密電閻錫山，大力舉荐傅升任師長：

> 職部第四旅旅長傅作義，忠勇成性，幹練有爲，此次堅守天鎮，其一切運用指揮，尤爲超出群衆。此固帥座所悉，勿煩職之贅述也。查大同傅師長汝鈞，資望功績與傅作義相伯仲，而作義練兵成績尤爲彰著。天鎮責任比同尤難，擬請仿傅汝鈞例，請將傅作義升師長，以勵有功，而昭激勸。職之爲此，非敢有私，實以該員爲不可多得之人才，深堪依畀，倘蒙俯准，必能爲帥座添練勁旅，建樹殊勳，除已電請總指揮轉請核奪任命外，可否之處，敬祈鈞裁。[54]

---

[50] 見[47]，頁一三七～一三九。

[51] 東亞同文會編纂《支那省別全誌·第十七卷：山西省》（東京，編纂者印行，一九二〇年），頁一二四。

[52] 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一〇一～一〇二。

[53] 同[47]，頁一三九。

[54] [54]〈平魯謝總司令勝密敬一電〉（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到），《閻檔——會攻南口與防守雁北之三》，頁一八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幾天之後，謝濂再密電閻錫山，推許傅作義爲「將才也，晉軍官中不多見者也。倘能破格拔擢，定能不負委任」，不僅如此，「其部下官兵亦多忠義奮發堅苦敢戰之士，以之擴充，幹部既良，勁旅可期」。謝濂謂其屢次保舉傅，是「實有感於千軍易得，而一將難求，效古人薦賢遺風也。且經此次戰後，益深信兵貴精而不在多，我山西果有如傅作義者八人，練兵八師，期以數年，有鈞座運籌在上，專任而信使之，則北方之亂，不足平也」。[55] 故國晉戰爭結束後不久，傅便升任第四師中將師長，時年僅三十二歲。

民國十六年秋，晉奉關係惡化。九月二十日，傅作義接到晉軍（北方軍）總司令部之動員令，令第四師由蔚縣出發，進出涿州、良鄉方面，橫斷京漢、京綏兩路敵軍之連絡，相機進據天津、北京。令別動隊第十四師（師長李服膺）、第四師各按預定之企圖，務於作戰各期中，使京漢、京綏兩路主力軍成功容易。通令各軍應於九月二十九日奉令開始攻擊之日起，互相連絡，戮力殲滅各自當面之敵人，達成本軍國民革命之重大任務。是爲晉軍第四師北伐任務之開始。[56] 當日晚九時，設於太原的晉軍第四師司令部即下達該師之動員令：

㈠ 頃據諜報，奉軍在平地泉、豐鎮附近被我軍擊退，我軍第五師二十七團攻擊西灣堡之敵，戰況甚激烈，敵有潰走之樣，我軍以連合北伐軍，會師京津、掃蕩盤踞京津之敵人，於最短期內貫澈革命成功爲目的。

㈡ 本師以動員之關係，限各部隊於今明兩日（二十一、二十二日）完成動員準備。

㈢ 各部隊須聲言與大同第十四師換防，使敵勿稍感覺爲要。

㈣ 各部隊攜帶之裝備，皆依輕裝規定，彈葯一個半動員量攜帶之，衝鋒槍彈葯加倍攜帶，手榴彈、迫擊砲、步兵砲，均按一個動員量攜帶之。

㈤ 糧秣三日份，棉外套一件，山鞋兩雙，水壺一個，子彈袋一條，各色臂章數份。

---

[55] 〈右玉謝總司令濂密感一電〉（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到），同上，頁一九二。

[56] 夏壽田《涿州戰紀》（撰於民國十八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民國六十年），頁二四～二六。

臺灣大學圖書館資料庫

㈥ 官長准攜帶手槍一支（附子彈五十粒）、指北針一個、圖囊一個（附地圖報告紙等）、軍衣一套、大氅一件、山鞋兩雙、雨衣一件、毯子一條。[57]

當時晉軍的編制是：一個師轄三個步兵團，其中兩個團設一旅長，任前方指揮，師長直接指揮一個旅長、一個團長，[58] 傅作義的晉軍第四師，除由三個步兵團爲基幹組成外，另配屬了砲兵第四團的兩個營，及一個騎兵連、工兵連等部隊。其預定之戰鬥序列爲：第四師司令部（時駐太原，內有憲兵排、執法隊、便衣隊）、步兵第四旅（旅長白濡青）旅司令部（時駐忻州，內有旅執法隊）、步兵第三十六團（團長袁慶曾，時駐忻州平原鎮，轄三營十二連）、步兵第七團（團長張葆亨，時駐忻州，轄三營十二連）、步兵第八團（團長趙錦彪，時駐忻州平原鎮，轄三營十二連）、山砲兵第四團（團長曾延毅，時駐臨汾，轄二營六連，缺第三營）、騎兵連、工兵連、無線電信隊（時駐大同）、輜重（彈葯縱列、糧秣縱列）、患者運輸隊、衛生隊、修械隊。[59]

民國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傅作義下廣武集中令。次日，閻錫山召見傅，面授機宜。九月二十三日，第四師司令部自太原出發，步兵第四旅司令部、步兵第三十六團、第七團、第八團、山砲兵第四團，亦分別自駐在地出發。九月二十五日，師司令部至廣武，下應縣集中令，令大同無線電信隊赴應縣待命。九月二十七日，師司令部至應縣，師全部次第集中應縣。九月二十九日，總司令部下總攻擊令，令第四師準預定計畫提前攻擊。同日，傅作義下廣靈集中令。九月三十日，師司令部、師全部自應縣出發，準急行軍法前進。十月二日，師司令部至廣靈，師全部集中廣靈，無線電信隊自大同至。同日，下蔚縣集中令，步兵第八團先發，是日到達蔚縣，入城警戒。十月三日，師司令部自廣靈出發，到達蔚縣，師全部準強行軍法前進，集中蔚縣。第十四師之步兵第二十二團，是日續至蔚縣，總司令部作戰計畫：預定別動隊兩師取連絡，同出蔚縣，進至桃花堡後，第十四師先襲懷來之南口，

---

[57] 同上，頁五〇三。

[58] 楚溪春〈晉軍概況和"鐵軍"、"同志會"的內幕〉，《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一九六〇年），頁六九。

[59] 同[56]，頁二七～三〇，四九五～四九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四師續進良鄉、涿州。惟是時第十四師全部尚未集中，至者僅其前衛一團，不能依預定計畫尅日前進。[60] 於是傅密電閻錫山：

> 職於支日（三日）率全部到蔚縣，十四師到此祇有一團，李師長尚無到蔚確期。前鈞座規定職師遲該師一日發動，勢難再候。職擬按預定計畫，先期出動。[61]

十月四日，第四師全部在蔚縣休息一日，同日，接閻錫山電報，令第四師應於十月六日以奇襲占領良鄉或涿州，至於達成任務一般之方略，希獨斷專行之，又令：占領涿州或良鄉時，如敵退卻，應橫斷京漢路，相機進據北京或天津，否則固守之，以期吸收多數敵人，使正面主力軍作戰容易，一切悉本面授之機宜行之。傅奉命後，以奇襲計畫必須迅速、秘密，原定進出路線，必須經桃花堡，易爲敵軍察覺，不如自蔚縣東行，入九宮口，至大河南，再擇進出路，或沿拒馬河前行而入涿州，或迂道更東而出良鄉，猝然臨之，必能破敵。有人以九宮口一路行軍極爲困難而提出異議，傅謂：「山路愈難行，敵軍愈不備，任務所在，不可畏困難，此兵家第一奇策，奈何以困難失之，軍令中所謂獨斷行之者，正以此也」，於是計議遂定。[62]

十月五日，第四師全部自蔚縣出發，師司令部至大固城。次日，師司令部至馬頭村，舉行師部會議，以奇襲之兵，利在神速，良鄉較遠，決計直襲涿州。是日，軍行入九宮口，即叢山疊嶂，矗立雲霄，採樵小徑，曲折蜿蜒。其中之馬頭山尤爲陡絕，前行的馬足挨接後人的肩頭，士兵時有僵仆悶絕者，山中井泉極少，居民皆以甕缶儲雨水飲用，窪地偶有積潦，也以雜有大量泥沙，只能飲馬，不能用以炊飯。十月七日，師司令部至三里棚，次日，至大河南。[63] 傅作義於是日致電閻錫山，報告行軍情形：

> 職自出發以來，經過道路，係羊腸小道，或須攀山越嶺，艱險異常，

---

[60] 同[56]，頁三三一四〇。
[61] 〈廣靈傅師長盛密支一酉電〉（十六年十月四日到），《閻檔——參戰案》，卷二，頁二二。
[62] 夏壽田《涿州戰紀》，頁六八～七二。
[63] 同上，頁八一～八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沿途給養缺乏，草料均無，尤缺飲水，雖星夜兼程急進，尚不及尋常一日行程。現到大河南村，爲路所困，惶急萬分。茲爲輕便計，將步兵二十一連編爲挺進隊，由職親率挺進，不顧一切，以期任務得一早達。山砲步砲機砲等，留歸白旅長督率跟進，士兵除隨身彈葯外，帶糧秣三日份。[64]

其中砲兵部隊因須攜運重型武器，最爲辛苦，據參與此次行軍奇襲涿州的鄭元庥（時任第一營第二連中尉排長）回憶：

> 在行軍過程中，最使砲兵感到困難的是在易縣山中和淶水河間，山裡邊的路是蜿蜒小道，步兵通行不感困難，砲兵馱上器材，每個騾子都是三百公斤以上的重量，實在難走，坡又陡，路又狹，石灰縫裡嵌住騾子的蹄子拔都拔不出來。有時候實在不能走了，士兵們就將器材卸下來抬著走，好容易走了四、五天下了山，卻遇見河邊的水啦。一條河彎彎曲曲，從北岸渡到南岸，走不了幾步遠，又要從南岸渡往北岸。……河水又深，河裡的石頭經常絆倒騾子。士兵們脫光衣服，卸下材料，扶起騾子，然後再給騾子馱上走，這樣行一天軍，就得過七、八十次河。到了涿州城，士兵們腿上都有像魚鱗甲狀似的小綻。[65]

十月九日，師司令部至下莊，次日，至十渡，十月十一日，至張坊鎮（屬房山縣）。[66] 該鎮距涿州城有五十多里，其地背靠太行山，俯臨淶涿平原，是拒馬河流經數百里太行山區之後進入平原的咽喉要塞，境內窮山絕谷，道路崎嶇，行人尚且少有，更從無軍旅進出此地。所以晉軍第四師沿拒馬河絕徑到此後，竟未遇到奉軍的一兵一卒。[67]

---

[64] 同上，頁四九七。

[65] 鄭元庥〈回憶涿州之戰〉，《山西文史資料》第六輯（太原，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頁六五－六六。

[66] 同[62]，頁九三、九五、一〇三。

[67] 王暢、桂郁〈傅作義涿州守城始末記——晉奉兩軍涿州百日激戰史料〉，《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三輯（石家莊，一九八四年九月），頁五。

臺灣期刊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時晉軍第四師的先遣支隊長，由第三十六團團長袁慶曾擔任，下轄三營，其中兩營已抵達張坊鎮，由於過度疲憊，士兵皆卧地而憩。袁慶曾召劉子英、張守斌兩位營長計議，認爲張坊鎮瀕臨涿州，而晉軍至此，迄未爲奉軍發覺，應把握戰機，急進涿州。袁於是不等先遣支隊另一營到達，急忙踢醒卧睡的士兵，疾馳而至涿州城僅八里路的東里池村，立刻進行部署，以兩連兵力襲擊城東火車站，袁率餘部自北門長驅直入。適奉軍衛隊旅（旅長王之佑）之高占山團亦自南門入城增防，雙方在南大街相遇，由於入城奉軍士兵鈎戴黃色臂章，晉軍第四師則規定士兵單日戴黃，雙日戴紅色臂章，當天恰爲單日，奉軍以爲是友軍，毫無防備，晉軍突前發槍，奉軍驚散大半，餘兵走保城東南角，置機關槍於天主堂高處守之，雙方展開巷戰。[68] 據身歷其境當時在涿州縣城德享永糧食店當學徒的賈廷魁回憶：

>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一日上午，掌櫃派我去北關取麵，當時奉軍駐在城內，正趕上換防，軍隊來去習已爲常，沒有感到有什麼異樣。我把麵取回走到鼓樓時，忽然有五個騎兵與駐防軍的服裝不同，自北大街向南飛奔，過了鼓樓，往南不遠，槍聲響起，他們勒馬卷回還擊。當時我不知所措，槍聲停後，趕緊沿街旁回店。這時大街兩旁店門急忙關閉。一會兒，大隊馬隊自北門進城，槍聲大起，原來他們是山西軍隊。這天正是奉軍換防，大批軍隊已出城，接防的尚未完全進城，因奉軍情報不靈，晉軍突然來襲，事先毫無察覺，接防的奉軍先將槍支運進城內，子彈在後，雙方展開巷戰，因而奉軍吃了虧。[69]

晉奉兩軍在涿州城內南大街交火後，袁慶曾的先遣支隊兩個連也到達火車站，值奉軍自北方開來之一批士兵正在下車，遭晉軍突擊而退走，晉軍遂拆毀鐵軌，隨後奉軍發現突擊的晉軍人少勢單，復又集合反撲，晉軍被迫撤離車站。城內方面，巷戰竟日，晉軍第四師前衛營長孫蘭峰、支隊前衛營長盧呈瑞率部相繼馳抵涿州，於是分城守之（步兵第三十六團第一營守東城，

---

[68] [68] 參見同上，頁六；《涿州戰紀》，頁一〇三～一〇七。

[69] 賈廷魁〈被困涿州的回憶〉，《保定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一九八六年五月），頁一九〇。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期刊資料庫

第二營守南城，第三營守西城，步兵第七團第二營守北城)。至晚，散伏城東隅的奉軍，突然襲擊南門，晉軍守門排長和在城上巡查的兩名連長陣亡，奉軍進入南關，占據城樓，向前進至南大街，疊麻包爲壘固守。黎明，城外奉軍砲攻，奪取南關及北關，潰散的奉軍，至是大集，猛攻城東南、西南兩角，攀援城牆，墜而復上，城勢岌岌可危。城內南大街的奉軍則向北推進，與城外奉軍交相呼應。袁慶曾決定先掃除城內奉軍，急選便衣兵精銳一百人，猱行屋脊，越過高垣數重，俯臨南大街，投手榴彈炸擊奉軍，破其火網，奉軍死傷過半，放棄陣地潰走，城內肅清，城外奉軍同時撤退。[70]

十月十二日，由晉軍第四師後續部隊組成的先遣支援隊，在步兵第四旅旅長白濡青的率領下，從張坊鎮出發抵關先營，關先營以東有奉軍散布。傅作義下令，將後續部隊編爲左、右、中央三個縱隊。十月十三日，第四師司令部先發，傅至關先營督戰，白濡青率左縱隊自關先營出發，經普利莊、泗家莊、兩河、小朱家屯，擊退沿途奉軍，乘勝追至涿州城北的大石橋。城內晉軍出北門夾擊，盡俘其衆。左縱隊乃列隊警戒，從城外西北角起，經東北角，至涿州車站。右縱隊（由步兵第八團團長趙錦彪擔任隊長）自張坊鎮出發，經東、西城村、邊莊、小馬莊，與奉軍激戰於西坟村一帶，乘勝改道向楊家村行進至涿州城南，城內晉軍出西、南門夾擊，肅清殘餘的奉軍。右縱隊列隊警戒，從城外南門起，經西門至城西北角。[71]

這時，奉軍王之佑的衛隊旅旅部及第十七師（師長蘇炳文）的第八十團（團長房貴斌）陸續開抵涿州車站，王之佑認爲晉軍有一師，奉軍只有一旅，衆寡懸殊，實難抵抗，遂將第八十團列車，擅留待命。[72] 十月十三日當天，袁慶曾命城內晉軍各以一連出城進襲，於是東門之第三十六團第二連，出攻涿州車站，據車站南端，奪獲奉軍步槍千餘枝；南門之第三十六團第六連，出應右縱隊，乘勝入車站，奪獲奉軍野砲三門、砲彈千餘發；西門之第三十六團第十連，出應中央縱隊，奪獲奉軍機關槍六挺、迫擊砲五門；北門之第七團第六連，出應左縱隊，俘奉軍一連、步槍百餘枝。騎兵、工兵出襲永樂

---

[70] 參見《涿州戰記》，頁一〇七～一〇八，一一一～一一三。；何暢、桂郁〈傅作義涿州守城始末記——晉奉兩軍涿州百日激戰史料〉，《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三輯，頁六。

[71] 《涿州戰紀》，頁一一四～一一五，一二一，一二三～一三〇。

[72] 常玉林〈回憶戰涿州〉，《保定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頁一八八。

車站，毀壞鐵橋。[73] 在這次城內晉軍出擊中，奉軍第十七師之第八十團倉猝下車應戰，傷亡很大，團長房貴斌負傷送回後方。[74] 同日，晉軍第四師之中央縱隊自張坊鎮出發，師司令部行進至西沙溝附近，遭奉軍步、騎兵攻擊，涿州車站之奉軍則以重砲遠射，彈密如織，師部軍中大震。傅作義從容指揮，一如平時，軍心爲之穩定。砲兵團團長曾延毅，登臨陣中高阜，親操大砲，一發擊中奉軍前鋒，再發擊中其續進者，奉軍氣阻，觀望不前，適見晉軍後隊馱騾，以爲大軍到來，遂相率引退。至此，第四師左、右兩縱隊均已進城，袁慶曾派便衣隊出迎，夾擊餘敵，將其逐走。十月十四日黎明，師司令部進入涿州城。[75]

縱合以上所述，可以歸納爲如下幾個重點：其一、此次奇襲行動係由閻錫山擬定（民國十六年四月，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加倫同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擬定的消滅奉軍計畫中，即有令晉軍以重兵占領石家莊，截斷奉軍歸路，另以一支軍隊進占涿州，堵截北京附近之奉軍南下，見本文第一章，閻的奇襲想法，或係源自此一計畫），傅作義出發前，閻曾召見其，面授機宜。其二、奇襲的目標爲良鄉或涿州，由傅作義見機而行，屆時自行決定。其三、襲占良鄉或涿州後，如奉軍退卻，即相機進據北京或天津，否則，固守之，以期吸引多數奉軍，使晉軍正面主力軍作戰容易。其四、閻錫山派遣傅作義及其第四師擔當此一艱鉅的奇襲任務，當係因傅驍勇沈作曾死守天鎮表現傑出所致。其五、傅作義所率奇襲部隊，已不僅一師之衆，除步兵三團外，另配屬有砲兵二營、騎兵、工兵各一連等（總兵力已逾七千人）。其六、此次奇襲行動前後歷時約二十日（自出發算起），其後半段中，傅部改道攀山越嶺，涉水渡河，備極辛苦，卒能發揮其奇襲效果。其七、十月六日，傅作義召開師部會議，以良鄉較遠，決計直襲涿州。其八、晉軍運氣不錯，其先遣支隊悄然入涿州城時，正值奉軍換防，原守城軍隊大部分已出城，接防的軍隊尚未完全進城，晉軍先遣支隊又攻其不備，巷戰竟日，遂完全占領涿州城。其九、奉軍援軍開至，城內外晉軍聯合夾擊，又經兩天戰鬥，擊走奉軍，晉軍第四師司令部始順利進駐城內。

---

[73] 同[71]，頁一三一～一三三。
[74] 同[72]。
[75] 同[71]，頁一三三～一三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慘烈的涿州攻防戰

涿洲爲古幽州地，商周因之；戰國時，涿爲燕國地；秦分天下爲四十郡，涿爲上谷郡地；漢加置郡國，分上谷郡地置涿郡，郡領縣二十九，置涿縣。三國時改涿郡爲范陽郡，晉爲范陽國，後魏仍爲范陽郡，齊周因之。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涿郡，領涿縣。唐武德初，改縣曰范陽，大歷四年（七六九），置涿州扼領范陽縣，遼金元因之。自唐五代以迄於元，易縣爲范陽，而涿州之名如故。明洪武年，省范陽縣入州，清因之，民國成立，改州爲縣，劃爲京兆二十縣之一。其縣治在北京西南一百四十里處，鐵路（京漢路）由縣北入境，經永樂、南關、松林店三車站，至蒼牛屯出境。其在昔爲京南各省冠蓋往來之孔道，商旅輻輳，貨物雲集。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京漢鐵路完成，不但交通便利，而市面之繁榮又逾從前數倍。全縣地勢平衍，漢魏以後爲胡馬往來之衝要，防守殊爲不易。縣城城周延袤一千六百四十九丈有奇（合九里五十九步），垣高三丈，基廣二十四尺，上較基少三分之一，雉堞二千一百九十九個。原爲土城，至明景泰初，知州事黃衡始甃以磚石，有門有樓。清康熙六年（一六六七），知州李勳重修，以後時加修葺，金湯之固，始自於此。[76]

民國十六年十月十四日黎明，傅作義進入涿州城以後，即召集全師官長會議，傅議曰：「涿州形勝地，且城堅如此，非出敵不意，未易拔也。敵重兵在保定，涿州扼北京之吭而拊其背，敵所必爭，我兵少，戰則形見勢絀，不如守城觀釁，棄其敝而後動，致敵而不致於敵，策之上者也。」遂計城守事，將其分爲兩大要項，一爲衛戍，由第四旅旅長白濡清任涿州衛戍司令，一爲城防，由第三十六團團長袁慶曾任涿州城防司令。[77]稍後，傅即下達防守命令，並對官兵作了一次簡短的講話：「我們這次出發，爬山涉水，露宿風餐，占領涿州。弟兄們堅忍忠勇，是很可喜的，刻下我們所占的地方，是敵人的制命點。所以這幾天，敵人用全力攻擊我們。但是革命軍人的精神是

---

[76] 宋大章等修、周存培等纂《涿縣志》（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國五十七年），頁二〇～二一，二五，三六～三七，七三。

[77] 《涿州戰紀》，頁一四三～一四七。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大無畏的。我們的城防越堅固，敵必盡全力來攻打我們。他們的前線兵力，就要被我們吸引過來。俟時機成熟，我們就大舉反攻，京津垂手可得。希望大家咬緊牙關，握緊拳頭，全力以赴與敵人決一死戰，勝利一定屬于我們的。」講話結束後，傅氏所部即在各防地構築防禦工事。除在各重要據點構築各種掩蔽部，卧、立、跪各式掩體，鐵絲網、鹿寨以及側射、斜射等各種工事外，並用手推車裝載磚瓦碎石儲放在敵人容易接近之處，以備必要時使用。又在城上每隔二十米設一土堆，以備臨時急用。設置機槍側防，每一城牆垛口附近存放大量土袋，以備填塞缺口。凡城牆突出部分或瓮圈內，多設側防。城牆垛口太低處爲避免危險，多設交通溝，多設監視哨所位置，構築城上堅固掩蔽部，並在構築中一面挖土築建，一面講解如何機動擊敵以及同友軍互相配合協同作戰，以收殲敵之效。[78]

涿州城外的奉軍，起初，只有王以哲一個衛隊旅，下轄三個步兵團，第一團團長劉多荃，第二團團長于兆麟，第三團團長韓麟徵，都是有較強能力的軍官。部伍訓練有素，裝備也比較好。晉軍據有涿州城後，由於京漢鐵路線距城只有千米左右，車站和往來列車均在城內炮火射程之內，所以往來列車如無奉軍炮兵開炮掩護，便無法通過。[79]十月十四日夜半，奉軍王以哲部調集炮兵，自城東南開始炮攻，在炮火掩護下，王以哲指揮第三團韓麟徵部爬城強攻。城上晉軍早有準備，奉軍反復衝擊，晉軍沉作應戰，奉軍死傷不少，攻勢頓挫。奉軍第三軍團軍團長張學良得知晉軍占領涿州城的消息後，立即增調奉軍第十五師黃師嶽部，第二十三師安錫嘏部、炮兵第六旅喬芳部取工兵司令柏桂林部等共計三萬多人，參加圍攻涿州之戰鬥。十月十五日黎明，奉軍使用大、小炮一百多門，猛烈轟城，並有飛機在空中助戰，奉軍如潮湧般衝鋒而上，戰況極爲激烈。守城晉軍以北城吃緊，而東南方面炮聲漸疏，城防司令袁慶曾亟令城東南嚴加戒備。不久，奉軍果然襲城東南，同時三方蟻附爭城，前仆後進，守城晉軍投手榴彈，一彈有死至數十百人，有投

---

⑦⑧ 孫蘭峰〈隨傅作義將軍堅守涿州親歷記〉，《內蒙古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六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頁一三一。

⑦⑨ 王暢、桂郁〈傅作義涿州守城始末記－晉奉兩軍涿州百日激戰史料〉，《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三輯（一九八四年九月），頁八。

至數十百彈者，自平明至日中，奉軍五次薄城，均被擊退。[80]奉軍這次總攻擊，係以雲梯爲爬城工具，三面圍攻。涿州城高三丈六尺（按：《涿縣志》記載爲三丈），而雲梯才高一丈，立一個不夠，要三、四個接在一起才起作用，奉軍事先未作好連接，在晉軍猛烈砲火之下，無法登城。由拂曉到日出，奉軍傷亡甚大，也沒有一人能夠爬上城牆。[81]擔任攻城的奉軍第十五師師長黃師嶽且被子彈打傷。[82]

十月十六日黎明，奉軍展開砲攻，自城東南、東北兩方，測射城中，以雙塔及鼓樓爲目標。[83] 雙塔因高十數丈，站在塔頂，城外數十里均可清晰在望，奉軍以爲上面必定設有晉軍砲兵觀測所，於是調來兩門加農砲，在離城三里的西河村放列，轟擊塔頂，一發砲彈擊中南塔（智度寺塔）塔頂南角。但在放第三砲時，砲彈在砲膛內爆炸，碗筒被炸毀。因爲傳說涿州雙塔常有靈異，奉軍官兵又多迷信，從此不敢再繼續轟擊雙塔。所以，是日奉軍萬砲齊發，砲彈如雨，城內南北大街民房，幾乎夷爲平地，而雙塔卻得以保存下來。[84] 十月十八日，奉軍砲攻增烈，集中射擊城東北角。晉軍方面，傅作義下達出城逆襲令，由步兵第八團第三營營長衛振邦，率所部出東關，襲擊奉軍，傷其旅長一人，擊斃團長一人，俘虜奉軍士兵五十餘人，山砲五門，三八式步槍一百四十餘枝。步兵第七團第一營營長杜德昌，率所部出西關，襲擊奉軍，俘奉軍士兵一百二十餘人，三八式步槍一百餘枝。是日，城東北、東南兩角轟崩巨口，陣亡團附二人，副官一人。十月二十日，晉軍再下達出城襲擊令，由步兵第八團第一營營長盛子黃率所部出東關，擊退城東南之奉軍，追至城東火車站。步兵第八團第三營（營長衛振邦）出東關，步兵第七團第一營（營長杜德昌）出北關，兩營合擊城東北之奉軍，追至永樂鐵橋。[85]

其後，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七日、三十日、十一月七日、十八日，奉軍又發動第二、三、四、五、六、七次之攻城。參與圍攻涿州的奉

---

[80] 參見同上，頁八～九；及《涿州戰紀》，頁一五五～一五七。
[81] 常玉林〈回憶戰涿州〉，《保定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頁一八八。
[82] 岳超〈奉晉兩軍涿州之戰〉，《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一九六二年六月），頁一四一。
[83] 《涿州戰紀》，頁一六六。
[84] 同[79]，頁一〇。
[85] 《涿州戰紀》；頁一六八～一七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軍，後來增至五萬餘人，張作霖命第八軍軍長萬福麟負責指揮攻城事宜，第三軍團軍團長張學良亦至涿州督戰，戰況極爲慘烈，以下爲值得記述的事項：

(一)砲先步後的攻城模式：

據參與涿州攻防戰的晉軍軍官憶述，奉軍每次攻城，均是在攻擊開始前一小時，先用大砲向城轟擊，掩護其步兵向前接近城牆，當步兵進至城牆附近準備爬城時，砲兵即延伸射程，或停止射擊。在奉軍砲兵轟擊時，晉軍守兵藏在掩體內，僅留一個哨兵監視。到奉軍砲兵停止射擊其步兵已接近城牆時，守兵一齊自掩體出來，進入戰壕準備殺敵。等奉軍步兵進至守兵手擲彈（即手榴彈）投擲的有效距離內（三十公尺），守軍即開始以手擲彈回擊。有一次在東北角奉軍的步兵已爬上城四、五十人，但後續部隊未上來，結果被晉軍守兵用白刃戰拚掉了。[86]在第二次攻城時，奉軍的砲火最爲猛烈，《涿州戰紀》謂此役「砲攻之烈，自中國有戰事以來，未聞更加於此者」。[87]雖然涿州城高而且堅固，奉軍的七十五毫米野砲對城牆射擊不生效，八十二毫米迫擊砲不能命中城牆。[88]但如果集中砲火對城牆某一點作持久轟擊，亦有可能炸穿城牆。如十月二十二日，奉軍重砲集中城東北角，衝決一口，其步兵衝鋒而至，晉軍以側防機關槍及手榴彈擊退之。十月二十五日，北門迤東城壁，受砲彈傾圮，磚石盡皆糜碎，稚存土坡。[89]但奉軍砲兵始終無法轟倒整片城牆，因此奉軍步兵攻城就備極艱苦。起初使用雲梯爬城，甚至命每名士兵攜一梱穀草，打算垛成草垛，然後爬城，因遭到守軍火力攔阻射擊，穀草丟得到處都是，不僅草垛未能垛成，傷亡也很大。[90]第五次攻城時，奉軍特備裝有泥沙的麻袋數萬袋，木杆數千根，專供步兵爬城之用。[91]也有一次以工兵身扛炸葯箱，在砲火掩護下，飛跑到城下，堆積炸葯箱，予以爆破攻

---

[86] 鄭元庥〈回憶涿州之戰〉，《山西文史資料》第六輯，頁六七。
[87] 同[85]，頁一七六～一七七。
[88] 趙明義〈奉晉涿州戰役〉，《遼寧文史資料》第十四輯（一九八六年三月），頁六一。
[89] 《涿州戰紀》，頁一九一。
[90] 常玉林〈回憶戰涿州〉，《保定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頁一八八。
[91] 孫蘭峰〈隨傅作義將軍堅守涿州親歷記〉，《內蒙古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六輯，頁一三四。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城。[92] 均未能奏效。

(二)燒夷彈的使用：

奉軍在第四次攻城時，曾使用燒夷彈。事先，晉軍已慮及於此，十月二十二日，步兵第四旅參謀長朱錫章（亦作璋）議救火二事（專設消防、急增掩蔽）及安民二事（救護傷亡、收容婦孺）。次日，由朱錫章主持之火警預防處四所成立，另有消防隊（隊長由旅司令部副官楊鴻林、涿州商會會長朱德恆擔任），由旅部士兵五十人，涿州平善、吉祥兩水會爲隊員。救護隊（隊長由紅十字會會員王庶秋擔任），專司養療、掩埋。婦孺收容所（所長由商會會員王愛堂擔任），專司住宿、糧食。監督居民地窖掩蔽，則由涿縣代縣長李夢雲負責。增加木板，蓋覆厚土，凡易引火之物，皆予以撤除。十月二十七日，奉軍展開第四次攻城，奉軍工兵冒進至城根，掘埋炸葯，同時以散佈燒夷彈，雨射入城中，延燒街市。城中處處皆火，南城門樓瞬間化爲灰燼。朱錫章親率救火部隊，於砲彈密織如雨之下冒死出動，撲滅火警六十餘處，使涿州免於成爲焦土。當大火及於城東煤油公司時，朱錫章督率救火部隊奪出煤油十分之八，是後全城得免闇夜無見之苦，以及地道中燭照作工之用，皆取給於此。十一月七日黎明，奉軍展開第六次攻城，砲火集中城東北及西南之兩城角，城上防禦工事，毀蕩復盡。中午，砲攻益猛，各種砲彈中，以燒夷彈爲數最多。城中火起，南門延燒尤速。晉軍步兵第四旅旅長白濡青親率士兵撲救，先截斷城南火道，不令其蔓延，其餘燒夷彈所及，處處起火，皆隨撲隨滅，人心爲之大定，城守得以無恙，城內人民生命財產多賴此保全。[93]

(三)飛機、坦克車的助戰：

奉軍在圍攻涿州的戰役中，雖曾使用飛機，但使用的架數、次數都非常少，發揮的作用也不大。曾有飛機至前方散發勸降傳單，張學良曾乘飛機親至涿州上空視察。在各次攻城中，也曾有單機前來執行轟炸任務。有一次竟

---

[92] 同[88]，頁六二。

[93] 《涿州戰紀》，頁一八六～一八九，一九三，一九六～一九七，二一八～二一九，二二一～二二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將炸彈誤扔在奉軍陣地，炸死、炸傷許多士兵，從此，一聽到機聲臨近，圍城奉軍便首先跳出工事，向後方奔避。[94]坦克車所發揮的作用較大，十月二十四日，奉軍坦克車進攻涿州城之南關，晉軍東南、西南兩城角之砲兵，集中火力，擊退之。十月三十日，奉軍第五次攻城，以坦克車掩護其步兵，爲波浪式之攻城。十一月七日，奉軍展開第六次攻城，奉軍步兵在砲火掩護下，分成數路，同時爬城，坦克車直抵城根，爲城崩缺口時衝鋒之準備。是日，奉軍坦克車在城東南角外，被晉軍側防砲兵團以零線子母彈擊毀其中二輛。十一月十五日，奉軍猛攻城西南角，同時城東北角方面，以坦克車掩護步兵爬城數次，晉軍側防砲兵擊退之。十一月十八日，奉軍坦克車衝鋒至南關，晉軍城角砲兵擊毀其中一輛，駕駛員死於車中。[95]當時奉軍共有坦克車三十六輛，均係購自法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報廢品，行駛時聲音特別大，動作卻很緩慢，而且不是全金屬製品，大小輪子，均係木製，外面包上一層鋼皮，正面裝甲相當厚，可以抵禦機槍及手榴彈，車上配有平射砲一門，機關槍一挺。奉軍第八軍軍長萬福麟，特別調來其中六輛，助攻涿州，主要目的是消滅城頭機槍火力點，詎料竟然損失了半數（三輛）的坦克車。[96]

(四)地道的挖掘：

奉軍前幾次攻城，由於砲兵無法轟塌城牆，步兵衝鋒、爬城，均被守軍擊退，傷亡慘重。因而改變攻城方式，派工兵二營，在涿州的東、南、北三面，挖掘地道。[97]地道高四尺，寬四尺，在距城數百公尺處開挖，因工兵不敷分配，特打電報至北京，強迫調動門頭溝煤礦工人數百名前來涿州幫同作業。[98]企圖挖至城門樓下面，用棺材裝滿炸葯，轟塌城牆和城門樓，地面部隊發起攻擊，一舉占領涿州。[99]不過，此種地道每前進三十或五十公尺，必

---

[94] 岳超〈奉晉兩軍涿州之戰〉，《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頁一四二。
[95] 《涿州戰紀》，頁一九〇，二〇八～二〇九，二一八～二二〇，二四四～二四七，及二六二。
[96] 同[94]，頁一四三。
[97] 常玉林〈回憶戰涿州〉，《保定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頁一八九。
[98] 同[94]，頁一四一。
[99] 孫蘭峰〈隨傅作義將軍堅守涿州親歷記〉，《內蒙古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六輯，頁一三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須向上留一通氣孔，每早太陽出來前，通氣口冒出的熱氣，易爲城上守軍所望見。[100] 十月十八日，晉軍出城逆襲，從奉軍俘虜口中得知新自保定開抵涿州的奉軍增援部隊中，有技術隊一大部。十月二十二日，晉軍召開城防會議，傅作義以城防工事堅固，奉軍死傷既多，必思變計，且保定技術隊至，其爲從事地道，可以斷言，令衆議預防之策。旅參謀長朱錫章請於城內周圍挖掘壕溝，以斷外道，從之。十月二十六日，天甫黎明，日光未出時，晉軍守城士兵登城瞭望，見城外西南方地上有白氣上升，斷定爲地道中的通氣孔，可由此推知地道距城的遠近。只是日光一出，白氣即不可復見。地道發端若干處（凡距城最近林木隱蔽處，即爲地道發端所在），均依此望氣法探之，果然發現西南方的地道，掘橫壕阻斷之。十月二十八日，城內壕工開始，壕深二丈七尺，寬六尺，周城約二十二里，以出壕之土，積爲內城。壕工分成四段，自城四角起工，以七日周通之。十月二十九日，傅作義訓令城防司令關於地道攻城之守禦法，由官長口頭傳達士兵全體知曉：其一、凡城牆被地道轟破缺口時，城上守兵及同方面之預備隊，應不俟命令，立即赴缺口防堵。其二、兩側支援，應以集中之火力，將缺口嚴密封鎖之。其三、砲兵及重機關槍、迫擊砲隊等，應就地形施行側射斜射各法，同時阻擊後方續進之敵。其四、凡城牆發現缺口時，第一線之預備隊，實負堵口之責任，不待命令。其五、凡敵兵搶口潮湧而上時，應以各種火力集中殲滅之。其六、凡守兵或增援隊能先占據缺口，阻止敵兵前進者，受上賞。十一月八日，晉軍會議地道攻城之防禦，決定預掘周城長壕，如護城河形式，使奉軍地道遇壕中斷，不得近城，或通入城內，其埋葯炸城及地底突襲之計，皆無所施行。惟奉軍圍攻，近迫城垣，守軍不能爲城外種種工作。定議先由城內開掘向外支壕數十道，經越城根，直行約十公尺，左右橫行，節節相通，而成地底之周城外壕，其掘出之土，仍由支壕運入城內，築成複城，以備城身崩壞時，作爲第二層防禦線。於是遂下令，令城防司令督掘周城地底長壕，頒發地壕總分各圖，派定各營分段工程，按圖中方向尺寸，即日開始工作。十一月十日，晉軍又會議地道守禦諸法，條集衆議爲地道守禦大綱，擇其簡要，爲士兵所必周知者，令各部官長以次面訓兵士，洞曉其意。計有「總論守禦

[100] 趙明義〈奉晉涿州戰役〉，《遼寧文史資料》第十四輯，頁六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優勢」三條：其一、敵人擬由地道轟城，必掘進數百公尺之遠，始得接近城根，我軍但掘八、九公尺，即能截斷之。其二、敵人掘至城根時，非埋藏極多之葯量，不能炸動城身，即使炸動，不過將城牆挫下數尺，或洞穿一口，我兩側之交叉火力，仍能封鎖之。其三、轟城爲一種威力作用，必守城者驚皇失措，敵人乃有隙可乘，其實爆炸之力深在地底，並不直接傷人，儘可視若無事，從容應付之。「測度敵方路線」四條：其一、凡城角及其附近之兩側，多爲敵人地道掘進之路線。其二、凡村落凹道森林處所及高地之後方可以隱蔽瞭望目光者，多爲敵人地道之入口。其三、凡敵人地道已被發現破壞者，其兩側及後方，多爲改闢支道之處。其四、城外平地發現之透氣孔，多爲敵人地道經過之點，即非正道所在，其正道亦離此不遠。「守禦要領」三條：其一、凡各城角及上述種種可疑之點，應特別注意，審定來道方向，向前迎截，除周城幹壕已由城內守兵分段程工，積極進行外，其四關守兵亦應各掘支壕與幹壕連接一氣，免留空隙，使敵人有機可乘。其二、當周城地壕工事未完成之前，地道守禦尤應加嚴，凡地上發現透氣孔時，無論地道是否在此，均須特派奮勇兵，或利用隱蔽地形，或乘黑夜投以黃色炸葯，破壞其透氣孔，此後注意其兩側有無特別狀態發生，並對此方向加工進掘，埋甕靜聽。其三、埋甕之法，甕口前向，甕底鑿一小孔，以耳就孔聽之。「臨時處置」六條：其一、凡地道作業，均須靜定，至聽出敵人之音響時，尤宜特別沉著，辨其方向及遠近。其二、敵人在前方，可先以衝鋒槍突擊之，再加爆破，在上層及下層時，均投炸葯爆破之。其三、聽得敵人之掘土音響，在繼續不輟時，足見其尚無警覺，若判定其距離尚遠，則宜沉靜以待，亦可向前迎掘，但宜格外審愼，不可稍露音響，若判定其距離已近，則宜迅速爆破之，或待其自行穿通，以衝鋒槍殲滅之。其四、聽得敵人之掘土音響，忽然中輟時，足見其已有警覺，須將作業人員退出，留少數人靜聽，若於沉靜中微聞有裝葯聲息，應先發制人，立即施行爆破。其五、我方偶因他故發露音響，敵方警覺因而輟響時，尤須決然先行爆破，不可猶豫。其六、施行爆破時，設遇雷管雖響，而炸葯未爆，應斷然續施第二次之爆破。十一月十四日，城東北角地壕中初次發現奉軍地道。是日，晉軍地壕自城東北角掘出十餘公尺，聽得掘土音響，近在足下。晉軍士兵即以鐵鍬輕掘下，忽穿一孔，透出電光，立投炸彈一枚，斃敵一人，餘皆驚逃。晉軍士兵隨將小孔掘大，

奮勇兵及預備隊均躍下，追擊至七十餘公尺處，裝炸葯畢，退回發火，爆聲震地，倉卒間，傷晉軍士兵五人，工兵排長一人，工兵震暈復甦者二人。十一月十五日，晉軍發現城西南角外平地上有一地道透氣孔，在西南及迤東兩支壕之間，令第八團第一營速掘特別支壕迎截之。是日薄暮，晉軍在城西南角地壕中聽見掘土音響，正在頭上，立即裝置炸葯，發火之後，葯未開炸，重裝之際，爲奉軍所警覺，先施爆炸，晉軍第三十六團第二營士兵二十隨人被炸死壕中，城身坍陷十餘公尺，奉軍乘勢向坍陷處肉搏衝鋒十餘次，最後踐尸登城，將旗幟樹立城上，奉軍歡聲雷動，以爲必克。是時，城上守兵不足十人，以手榴彈拒擊，第三十六團之奮勇兵四十餘人，由兩側面馳至夾擊，盡殲登城者，餘衆罷攻引退。[101] 據參與是日之役的奉軍軍官記述：奉軍地道同時在九處開挖，有八處被破壞，僅西南城角一處成功。[102] 地道內裝有三十多噸炸葯，奉軍以第十七師第八十團第一營爲攻城先頭部隊，先由奉軍工兵引爆炸葯，城牆被炸成約有二十公尺左右之豁口，地面爆炸口約有十公尺。第一營隨即發動攻城，但因地道裝葯太多，鬆土太深，作爲先頭連之第一連官兵不能前進，城內守軍全力堵擊爆破口，其它城牆上的守軍，也左右支援，一時砲聲四起，第一連傷亡慘重，只剩下連長、三名排長和八名士兵。[103] 十一月十七日，晉軍增加城西南缺口鹿柵，令地壕工兵加意審聽地道音響。是時，城內晉軍除傷亡病困，約計官長士兵已不足三千人。十一月二十三日，晉軍周城地壕及城內複城，同時竣工。並且由地壕掘通城上，置錢板爲井口，平時蓋覆之，臨時由地底突出射擊。十一月二十七日，晉軍在城東北角地壕中，聽見掘土音響，方靜待間，偶失愼發聲，急爆破之。十一月二十九日，晉軍在西南城角地壕中又聽見掘土音響，在前方三、四十步之間。乃向前掘土迎之，令奮勇兵出南關，沿城壕前往偵察，覓得其透氣孔，窺見電光，並聞人語，急用小鐵鍬掘大其孔，繫下炸葯，拉動火線，轟然一聲，之後，西南地壕內所聞音響同時中輟（十二月四日，晉軍在城西南角地壕掘得奉軍尸體二具，其中一人爲軍官服章，一爲士兵，並獲多種工具如鐵

---

[101] 《涿州戰紀》，頁一七〇，一八五，一九〇～一九二，一九九，二〇五～二〇六，二二二～二二五，二二八，二三九～二四〇，二四二～二四六。

[102] 岳超〈奉晉兩軍涿州之戰〉，《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頁一四二。

[103] 常玉林〈回憶戰涿州〉，《保定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頁一八九。

鍬、鐵鍋、鐵鈀等）。十一月三十日，晉軍於西南城外發現透氣孔二，距城不及百公尺，東南城外發現透氣孔一，均投炸葯炸毀之。又於東北角地壕內聽得掘土音響，急行爆破之。頃之，東南、西南、東北三城角外，炸葯爆破之聲，陸續並作，此係奉軍於已毀之地道，恐爲人利用奇襲，而重加爆破。此後，晉軍遂久不聞掘土音響，城上瞭望，亦不見地面氣孔發露，地道攻城，全然結束。[104]

(五)毒瓦斯彈的使用：

據參與涿州之戰的奉軍軍官憶述：奉軍因屢攻涿州不下，負責指揮攻城的第八軍軍長萬福麟，特別調運來毒瓦斯彈五百發，彈頭有紅有黑，紅色的是燃燒彈，黑色的是毒瓦斯彈。彈身長兩尺多，有尾翼，插入砲膛時，彈頭伸出在砲口外面，用小鋼砲四門同時發射。發射前，萬福麟親自到砲兵陣地視察，還說：「我作了損啦！不用說城裏的人，就連耗子也會給燻死」。待五百發毒瓦斯彈和燃燒彈發射完畢，步兵部隊開始攻城，不料城上仍然槍砲齊發，攻勢又遭頓挫。萬福麟召來指揮化學戰的白俄人質問其原因，答曰：「砲彈太少！歐戰時一次戰役發射幾萬發，有效！」實則此種毒瓦斯彈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剩餘物資，或者早係已失效的廢品，有幾發出膛就落地，發出煙霧和怪味，把砲兵陣地的官兵嚇得亂跑。[105] 十一月二十三日，傅作義自涿州密電閻錫山，謂「敵彈確有毒瓦斯，曾以簡單防禦告兵民，然仍有不能服務及致斃者。其目無公法，罔顧人道」，請閻「電告中外，扶持公理。」[106] 次日，閻電復傅作義，謂「敵用毒瓦斯，已通電全國，並請政府通電中外矣」，並告知傅「可以極細之木炭末用布包，將口鼻等呼吸機關掩護之」以防禦毒氣。[107]傅即頒布預防毒瓦斯簡便方法：用濃鹼水將棉花浸透，蒙於鼻孔上，外用白布或毛巾紮住，或用布或以手巾，將柳炭屑包在口鼻之間，則

---

[104] 《涿州戰紀》，頁二五〇，二五二，二七六～二八〇，二八五～二八六。
[105] 同 [102]，頁一四四。
[106] 〈涿州第四師傅師長統密養寅電〉（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閻檔——參戰案》卷三，頁一八六。
[107] 〈復涿州傅師長統密漾酉電〉（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發），同上，頁一八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凡一切毒氣，均失其效用。[108]奉系首領張作霖對奉軍使用毒瓦斯彈一事，一再否認，其在致閻錫山電報中，更是信誓旦旦，飾詞狡辯，謂「毒瓦斯之用，外國人藉以制生番擊野獸，涿州之寇，窮寇也，籠鳥釜魚，早晚間事，何忍用毒瓦斯愛我涿州之民」?「若不顧人道，不愛吾民，則以我軍數萬健兒取此彈丸之地，不猶易如反掌，何致經旬不下也」。[109] 由於奉軍擁有毒瓦斯彈之數量有限，使用於涿州的次數也極少，加以品質不良，對於城內軍民的殺傷作用並不大。據城內晉軍士兵後來說：「這種砲彈發出的氣體比空氣重，直往地下室或壕溝裏沉，氣味使人作嘔心，我們在高處，就沒有受害」。[110]

奉軍大軍七次攻城，歷時一個多月，使盡各種辦法，始終無法攻克，而且傷亡慘重。於是自毀地道（十一月三十日），停止攻城行動，改於城外四周挖掘深壕，壕深一丈，寬兩丈，[111]作長期圍困之計。十二月四日，奉軍圍城長壕完成。其後長圍工事，日臻堅固。深壕之外，電網地雷，周環無隙。[112] 雙方一直相持至次年一月中旬。

至於晉軍，以七千之衆，堅守涿州，奉軍以五萬餘人之優勢兵力，七攻不克，而且傷亡慘重，其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如前所述，涿州爲一完整古城，城高而且堅固，奉軍砲兵、工兵無法轟倒、炸塌整片城牆，致步兵攻城，難以奏功。誠如傅作義在「與各部隊誥誡士兵沉著應戰之白話諭文」中所說：「敵以砲攻城，其步兵必離城甚遠，即或將城打一破口，其步兵亦決趕不到。若要趕到時，他的砲兵必改變目標，不敢再打城牆傷害自己。我想我們防禦，雖漏出一點空隙，有兩枝機關槍，便可封鎖。三兩個手擲彈，就可打退了」。「敵若用地道轟城時，我自亦可由地道迎出以破壞之。縱或被敵轟破一口，我們立即用火力封鎖，用預備隊增援，敵人仍是白費力。」[113] 其二、晉軍擁有守城利器—手擲（榴）彈。係山西兵工廠製造，殺傷力特大，在軍閥內戰時，名噪一時，閻錫山視此爲寶。[114] 山西兵工廠在開始製造手擲

---

[108] 傅作義〈呈報敵用毒瓦斯彈射擊事先預防幸告無恙江寅電文〉（十六年十二月三日），《涿州戰紀》，頁五一。
[109] 〈北京張雨亭漾電〉（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閻檔——參戰案》卷三，頁一八七。
[110] 岳超〈奉晉兩軍涿州之戰〉，《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頁一四四。
[111] 同上。
[112] 《涿州戰紀》，頁二八七，三一六～三一七。
[113] 同上，頁五四〇～五四一。
[114] 王振洲〈記傅作義將軍二三事〉，《山西文史資料」第三十二輯（一九八四年），頁七七。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彈時，曾研究樣式分帶繩與木柄，彈體分鐵皮與鑄鐵。試驗結果，威力、攜帶、投擲均優者爲木柄鑄鐵彈體。另試製一種槍擲彈，由於易損壞槍支，且彈爆炸點不準確，未被採用。又爲增加威力加重炸葯量，做頭號手擲彈和手雷，專爲守城堡山口之用。[115]一位曾參與涿州之戰的晉軍軍官認爲：涿州歷次戰鬥，晉軍所以能取得勝利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憑了山西的手擲彈的威力。山西手擲彈容易炸，破片多，殺傷效力大，尤其頭號手擲彈，扔出去就和迫擊砲彈的效力一樣。[116] 其重量四倍於普通手擲彈，攻城之奉軍不知對方有此種武器，因而在爬城時，蒙受重大傷亡。[117]其三、傅作義的卓越領導，致晉軍精誠團結，戰力充分發揮，卒能一一擊退攻城奉軍。據傅作義的堂弟傅作信記稱：傅作義七、八歲時，常常到洶湧的黃河裏游泳，而且騎無鞍的馬奔馳於村東和村西，毫無懼色，跳進村人迷信認爲是鬼作祟的旋風裏用樹枝棍棒亂打，村人背後議論說：「這個孩子天不怕，地不怕，長大了，好了可能成才，不好，很可能是傅家的敗家子」。[118] 民國十五年國（國民軍）晉戰爭中，傅作義率部死守天鎮，其膽大、既狠又能忍的個性，已顯露無遺，加以有了一次守城成功的經驗，再守涿州，應不致於手足無措。再就傅作義的學養而言，他畢業於保定軍校第五期，保定軍校是民國北洋政府時代（一九一二－一九二八）規模最大、最正規化、培養人才最多的一所軍事學校，其最具特色的一點是學生素質高，尤其是其第一、二、四、五、六、七期學生，都是經過逐級（陸軍小學、中學）的嚴格訓練、考核，最後精選上來的，素質最高。[119] 因此傅作義具有相當不錯的軍事專業知識，毋庸置疑。此外，傅氏帶兵，極重視紀律。初入涿州時，傅召集全師官長於師司令部會議，曾曉諭各官長：「兵民相處至難，客兵始至尤難，大要立法必先嚴明，而臨事出之以和易，未有不辦者也。作義往守天鎮時，嘗使兵爲民服勞務，又爲兵民計口授食，多寡如一，兵民皆知彼此同利害，同甘苦，乃至同生死，以故相親愛如家人。然其始未嘗不嚴法以約束之，法立而後知恩，此必不易之道

---

115 周維翰〈山西兵工史料〉，《山西文史資料》第九輯（一九六四年八月），頁二六。
116 鄭元庥〈回憶涿州之戰〉，同上，第六輯，頁六八。
117 趙明義〈奉晉涿州戰役〉，《遼寧文史資料》第十四輯，頁六一。
118 傅作信〈回憶青少年時期的傅作義〉，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傅作義生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四三六～四三七。
119 李金錚〈論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近代史研究》一九九五年一期，頁二一四，二二〇。

也。」遂下「與各部隊入涿城後部署防務並嚴申紀律之命令」，其中第十條爲：「官兵軍紀須嚴肅，對於商人，務秉公交易。對於民衆，務相親相愛。倘有欺壓民衆，及破壞軍紀者，一經查覺，按軍法懲處，決不姑寬。」⑳《涿州戰紀》謂「傅先生之守涿州也，凡三閱月，問其何以能守也？曰士卒信其主將，故能以守，曰涿之人信之，故能以守也。」㉑十月十四日晉軍進占涿州後，傅作義即訓誡守城士兵曰：「凡攻城者，先以火力壓迫，敢死衝鋒繼之，循環不已，以俟守者懈怠，一鼓登城，此一定之法也。不知火力猛時，敵我皆不敢犯，砲止衝鋒，彼肉薄而前，我憑城而待，雖循環而至，彼常肉薄，我常憑城，彼以血肉當槍彈，我以磚石當槍彈，勝利在我，不待言也。」又示士兵側射之法，曰：「凡正面敵至，彼我對射，心動手搖，難以取準，不如就地形取側面射擊法，左射右，右射左，不顧當面，心專手定，無不中的。」十一月二日，傅作義親定城腰工事各種斷面圖，頒發士兵。依圖構築。次日，傅巡視城腰防禦工事，親爲講解指導。㉒據參與涿州之戰的晉軍步兵第八團團附柴濟川回憶：傅曾面告其對於偵察敵方挖掘地道的方法及時機，和竊聽聲音遠近的要領，多方留意各種徵候等。㉓又傅作義爲激勵士氣，常對部屬作精神講話或頒發白話諭文，如「與各部隊誥誡士兵沉著應戰之白話諭文」、「與各部隊勉勵士兵之白話諭文」、「與各部隊誥誡士兵節省子彈之白話諭文」等。㉔傅作義爲了鼓勵士兵發現奉軍地道的透氣孔（氣眼），宣布：每發現一個，賞現洋五元。所以在每天清早，守兵們都爭先恐後用砲兵的望遠鏡和步兵的監視鏡，向地面上巡視一回。又爲了鼓勵士兵們不丟掉陣地，在奉軍攻城激烈時，常以懸賞辦法勉勵士兵，如果不丟失陣地，賞洋三百元或二百元。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在一次城西南角戰鬥中，一位下士班長，一個人就扔了二十多箱手擲彈。手指頭上掛滿了拉火繩，又用口咬拉火繩向外扔。㉕對於涿州晉軍第四師的英勇表現，閻錫山於十二月八日電令敍

⑳ 《涿州戰紀》，頁一四五～一四六。
㉑ 同上，頁二六九～二七〇。
㉒ 同上，頁一五三～一五五，二一三～二一四。
㉓ 柴濟川〈傅作義固守涿州之役〉，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國民革命軍北伐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二九四。
㉔ 以上各白話諭文全文，載《涿州戰紀》，頁五四〇－五四二。
㉕ 鄭元麻〈回憶涿州之戰〉《山西文史資料》第六輯，頁六八。

臺灣期刊雲端資料庫

功行賞：「該師固守涿城，力撐大局，忠勇奮發，嘉慰良深，所有全師官佐，著一律進一級待遇，頭目均以排長記名，士兵賞銀十萬元，其尤特別出力之官佐士兵，著該師長擇保。陣亡官兵，均著進一級議卹。而其死事最烈者，幷著該師長查報，從優卹賞。仰即轉飭一體知照。」[126]

四、議和、善後及其影響

晉軍自民國十六年十月十一日襲入涿州，憑城固守，至次年一月十二日出城接受奉軍改編，爲時長達三個月。最後守城晉軍之所以妥協，其原因如下：

(一)外援完全斷絕：

民國十六年九月底，晉奉戰爭爆發，晉軍主動出擊，奉軍措手不及，節節敗退。但好景不常，十月四日，張作霖下討伐閻錫山令，兩三天之後，奉軍在京漢、京綏兩路佈置完畢，開始反攻。十月八日，奉軍擊敗京漢路之晉軍右路軍（徐永昌、傅存懷部）於望都，十月十日，晉軍右路軍第三軍楊愛源部在京漢路失利，閻錫山下令撤退，同日，奉軍攻占定州。次日，晉軍右路軍退守石家莊（同日，晉軍傅作義部襲入涿州）。十月十三日，京綏路之晉軍左路軍商震部，因京漢路之右路軍已退，作戰計畫改變，即自下花園，宣化西撤柴溝堡一帶（次日，晉軍第四師師長傅作義及其師司令部入涿州）。十月十五日，奉軍攻占張家口，十月十七日，攻占石家莊，十月二十八日，攻占柴溝堡，十一月二日，攻占陽高，晉軍左路軍商震部分別退守晉北雁門關、龍門關之線。十一月三日，奉軍攻占大同、蔚縣，十一月六日，攻占晉北靈邱，是日，閻錫山下總退卻令。十一月九日，奉軍攻占綏遠城，次日，攻占包頭，十一月十四日，攻占山西之平型關，進攻五臺山繁峙，十一月十六日，閻錫山親至五臺山督師。此後，五個月間，晉奉兩軍戰況陷於膠著狀態，無多大變化。綜觀此次晉奉戰爭晉軍先勝（爲時不到十日）後敗，敗得很慘，退保山西，依山固守，其原因約有數端：其一、晉軍大多無實戰經

---

[126] 《涿州戰紀》，頁四九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驗。民國成立及其以後十三、四年間，山西在素持「門羅主義」的閻錫山統治下，大體上省內安定，晉軍也極少出省征戰。民國十五年及其以後，政局益趨複雜，閻錫山雖無意改變其保境安民政策，但嚴守中立越來越難，山西捲入內戰，乃無可避免。[127] 先是河南樊鍾秀的建國豫軍入侵晉南，接著爲聯直奉討伐國民軍戰役（引發國晉戰爭），以及參加國民革命軍後的晉奉戰爭。由是可知晉軍參與大規模的內戰，歷史甚短（至民國十六年晉奉戰爭爆發，僅一年多），次數極少。加以擴軍過速（晉軍曾於民國六年、十五年、十六年三次擴軍）[128]，尤其是民國十六年的第三次擴軍，晉軍全軍，由民國二年時的二萬餘人、五年時的三萬餘人、十三年時的八萬人、十五年時的十萬人，急速增加至二十餘萬人。[129] 因此在晉奉戰爭爆發前，晉軍大多數爲新兵，訓練不足，且無實戰經驗，可以斷言。故晉軍處順境易，處逆境難，晉奉戰爭中奉軍大舉反攻，晉軍由順境轉入逆境，應變能力不足，容易驚慌失措，而致一敗塗地。其二、指揮權未能統一。其三、各路聯絡不上。其四、兵力部署不當：晉軍將士北進心切，將所有軍隊，強半運至前方，後防佈置，過於空虛，而右路兵力，亦嫌單弱，奉方窺破此中弱點，施以側擊戰略，急由定州某處，截斷晉方後路，加以定州城內，預伏有奉方大批便衣軍隊，故一經發動，雙方即互爲混戰。閻錫山以未明敵方之眞實狀況，乃令各軍急行西退，藉以保全實力，另籌作戰方策。[130] 其五、晉軍官長頗有武德竄敗，士兵軍紀掃地者：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六日敗退至山西境內繁峙的晉軍左路軍第五師師長王靖國密電閻錫山，憤然指出「竊維戰事，勝負爲兵家之常

---

[127] 陳存恭認爲閻錫山的政治立場，有「恆」與「變」的雙重性質，維持其統治地位是永恆不變的，而對外關係是游移飄動的，隨著時間空間的不同，衡量他擁有的力量與周圍的環境，他隨時改變敵友的關係，並調節他的統治策略。陳氏並分六個時期簡述閻統治山西的政策，第一個時期爲穩固統治時期（民國元年至六年），第二個時期爲保境安民時期（民國六年至十四年），第三個時期爲捲入內戰時期（民國十五年至十九年）。見氏著〈閻錫山與晉軍的興衰〉，《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二屆討論會》（台北，國史館，民八十二年），頁六九八～七〇四。

[128] 晉軍三次擴軍的經過情形，可見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頁八四～八七，一〇三～一〇五，一一四～一一五。

[129] 同[127]，頁七〇八。

[130] 以上第二、三、四項原因，係參見《大公報（天津）》，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四日，第三版之報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武德窳敗，實軍隊之隱憂」，隨將晉軍左路軍隊戰鬥及退卻之大弊擇要稟知閻氏，謂「當作戰時，團長以上軍官每怨自已軍隊多受損失，而以規避爲能事，或面告奮勇而行不踐言，或捏報敵情，妄冀增援，藉以減輕責任，或遇小部驚惶失措，或聞退卻而率先奔逃，以致高級指軍官者判斷無法，命令失效，宣化之未得進展，天鎮之提前退卻，未始非因於此」。「此兩次退卻，軍紀掃地，官長不帶隊伍，士兵任意胡爲，故拋棄彈葯，搶人衣物，無故放槍，拉騎民畜等事，觸目皆是。兩次退卻，職均在最後親見，沿途人民，逃散一空，且士兵私逃有攜械爲匪者，似此軍心渙散，實爲此後作戰之危險，擬請嚴令各軍速爲整頓以固軍心，並對於敵情、緊急方面，派多員監視以明眞相，庶幾尙可作戰，否則前途眞有不堪設想者矣」。[132] 王靖國密電所述，僅爲其個人所見所聞，視野、聽域都有其局限，不能據以斷定此現象普遍存在於當時所有參加晉奉戰爭的晉軍軍隊中，但即此冰山一角，已足以駭人聽聞。

此外，當時的政局形勢，也不利於晉方，馮玉祥之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被直魯軍及唐生智、靳雲鶚等所牽制，不克有效的與晉軍呼應；國民政府方面，寧漢分裂雖告結束，但內部問題尙多，汪精衛等人仍持異議，蔣中正下野迄未復出，不能併力北進，援助晉軍。以晉軍的實力、經驗、裝備等，單獨對奉作戰，欲澈底擊敗奉軍，可能性微乎其微。又由於戰局於奉軍有利，致原允作晉軍內應者，躊躇不前，不敢發動。

涿州方面，民國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傅作義入城之後，即致電閻錫山，請其飛飭晉軍前方各部隊迅速進攻，並請其分令晉軍第九師（師長吳藻華）東進聲援。次日（十月十五日），又電請閻氏示知晉軍已進至何處。由於傅軍於奇襲涿州途中，在山路行進，無線電震動過甚而受損，無法通信，對於晉奉戰情全然不知，故於電文中詢問閻氏。十月十七日，傅作義致電閻錫山，呈報奉軍圍攻涿州城情形，並詢問「正面情況如何，現達何處，乞示知」。同日，傅亦致電晉軍第九師師長吳藻華，詢問其軍隊刻在何處，務請從速東進，時時連絡，互作聲援，進而會師京津，完成建國大業。[133] 然不知

---

[132] 〈繁峙王師長永密魚申電〉（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到），《閻檔——參戰案》卷三，頁一四九～一五〇。

[133] 以上各電文，均載《涿州戰紀》，頁四九七～四九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何故，均不見有任何回電，傅當時內心的焦急，可以想見。十月十八日，傅致電閻錫山，向其呈報涿州最近戰況，並詢問「現鈞座駐節何處？方略如何？各部隊進至何處？請速示知。無線電修竣，叫不到我軍各電台，擬請速飭各通信所設法通信爲禱」。[133] 十月二十一日，閻錫山才電復傅作義，傅雖然收悉，但因字碼不明，於次日電閻，請其重示，並請閻將其主意先行示知，以便遵循。[134] 十月二十三日，閻電復傅，囑其「固守待援可也。」[135] 是時京綏、京漢兩路晉軍在奉軍大舉反攻之下，節節敗退，閻錫山正考慮放棄大同，專守雁門關。十月二十四日，閻收到晉軍左路軍總指揮商震自永嘉堡拍發的電報，商震認爲「退守雁門係爲敵以大部來攻，萬不得已時之辦法，倘能不用總以不用爲好。因此法不惟與士氣有礙，對於政治上、經濟上、交通上均極損失太大」，「再傅（按：指傅作義）、李（李服膺）、吳（吳藻華）三師未回之前，當然盡力援救，不能再退。若傅、李、吳三師歸來，損失不大，或反攻機會已到，亦不能再退」，凡此種種「均須詳加考慮，非至其時，不可驟行」。[136] 同日，傅作義致電閻錫山，謂「敵攻甚急，鈞座駐節地及各軍所在地，請簡單示知」。[137]次日，閻電復傅，謂「各軍所在地，昨已電復，現已派隊由該師進出路線出動，以冀打通道路，向前增援。余由獲鹿返省，赴大同督師」。[138] 由此可見閻對於傅多次的詢問，似乎一直避而不答，後來不得不回答，則避重就輕，飾詞以對，不願將晉軍敗退實情坦然告知，其用意或在安定傅軍之軍心。十月二十七日，閻收到商震、郭宗汾（左路軍參謀處長）自永嘉堡的來電，商震轉達所部左路軍各將領的意見，計分爲兩項，其一、全線早日反攻；其二、先令阜平方面部隊急趨涿州，即掩護右路軍，由京漢線出擊，左路軍由陽高、蔚縣一帶用主力同時反攻。[139] 郭宗汾的電報則在向閻報告「李、吳兩師（按：爲第十四師、第九師），安全抵蔚（按：指蔚縣），損失甚小，李師且有虜獲，吳師調陽原，刻正休息待命」，並表示

---

[133] 同上，頁四九九。
[134] 〈涿州傅師長統密碼電〉（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到），《閻檔——參戰案》卷三，頁九七。
[135] 〈復傅師長漾辰電〉（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發），同上。
[136] 〈永嘉堡商總指揮資密漾亥電〉（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到），同上，頁九七～九八。
[137] 〈涿縣傅作義統密敬酉電〉（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到），同上，頁一〇三。
[138] 〈復涿縣傅師長統密有己參電〉（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發），《閻檔——參戰案》卷三，頁一〇三。
[139] 〈永嘉堡商都統進密宥己電〉（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到），同上，頁一〇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間對涿州傅師，各將士均以除反攻外，別無善法。職意亦以四師如坐視不救，倘有意外，則日後用兵殊多不便，人械損失尤其小者，明知鈞座統籌全局，不願以一部牽制，但敵後方有此一城必死之士，前敵作戰顧慮亦多。右路各師補充，當有眉目，又新增八師一師，較之戰初力量，實不算少。左路團結後，攻取下花園，亦非難事。若待敵喘息既定，或變更辦法，則爾後反攻，必有困難也」，「輕敵固不可，過重視敵情，亦非所宜」。[140] 然而閻錫山是時已決定撤兵雁門，即於十月二十八日急電商震，囑其「撤兵既定，愈速愈好，勿再游移」。[141] 並於同日致電傅作義，告知其「援兵由涞源出發，急切難到」，傅軍「能守則守，能退則退，歸路可取小道，向涞源方面退卻。再張坊鎮、桃花堡，均有敵人」。[142]十月二十九日，閻錫山收到郭宗汾來電，郭認爲晉軍如退至雁門，「可顧慮者四」，其第四項爲「傅師退回，完全絕望」，並向閻建議「擬在渾源、小王峪、聚樂堡之線，行持久防禦。渾源佈置一師，守亂嶺關、小王峪之線，中間置步兵兩團，騎兵四團，連繫聚樂堡，置一師守豐稔山、採掠山之線，甕城口、大同分置預備隊。如敵小犯，儘可設法殲除，大犯則聚樂堡部隊可隨時向應縣撤退，以作第二步預備。八軍孫師（按：即第九師，師長爲孫楚）一部，仍留蔚縣，敵來則向北口撤退，以與渾源派至廣靈之前進部隊呼應，如敵不蔚縣來重兵時，則抽出步兵一兩團，連合孫師，打通傅師歸路，援救該部出城，不打通亦須遠出接應。因該部耐不住時，終必由此路退回也。此辦法雖不如退雁門澈底，但亦覺有一個之理由。此事關係至大，責任甚重，請鈞座勘酌速復」。[143]然閻心意已定，於同日電復郭宗汾等，謂「所擬辦法係就雁北方面敵人著想，原無不可。惟涞源方面敵攻甚急，龍泉大營方面亦有敵侵入之勢。則此辦法似難救目前之急」。[144]閻在同日致郭等人的另一電中，提出其對退守雁門的看法：其一、「我省財政雖屬困難，尚可支持半年」，其二、「張逆（按：指張作霖）

---

[140] 〈永嘉堡郭參謀處長進密宥電〉（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到），同上，頁一〇九～一一〇。
[141] 〈致永嘉堡商都統資密儉二亥參電〉（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發），《閻檔——參戰案》卷三，頁一一二。
[142] 〈復第四師傅師長統密斟電〉（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發），同上，頁一一一。
[143] 〈永嘉堡郭處長統密勘戌電〉（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到），同上，頁一一七～一一八。
[144] 〈復永嘉堡商都統郭處長資密艷亥參電〉（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發），《閻檔－參戰案》卷三，頁一一七。

在短期間內必倒，我若退守，固保實力，俟南軍北來時，加入反攻，可不費力而收最後之勝利，希一併計及之」。[145]涿州晉軍方面，傅作義於十月三十一日致電閻氏，謂「查現在情形，如行退卻，損失無論矣，餘者亦恐瓦解。敵攻雖急，職決固守待援」。十一月二日，傅再致電閻氏，謂「刻擬對敵用術策緩衝，希保實力，待機謀敵，以竟全功。否則惟有成仁，以報知遇」。[146]其已有殺身成仁的心理準備。十一月五日，閻錫山電復傅：「頃閱來電全文，不禁淚下，當仁不讓，執事有焉。我輩爲救國救民而革命，國人自當有以報我也」。[147]次日，閻下總退卻令。至是，涿州成爲名符其實的孤城，深懸於敵境後方，來自晉方的外援，已全然無望。同爲國民革命陣營的馮玉祥和南京國民政府方面，也都心餘力絀，無法北進馳援。較近、較有可能的外援，是經山西警務處長暨駐天津代表南桂馨運動允爲內應的奉方部隊（此外，尚有出沒於京畿一帶的晉方便衣隊，以及直（隸）南各地的民間武力紅槍會。晉方便衣隊，目的在滋擾，且人數太少，又過於分散，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直南紅槍會人多勢衆，惟素無政治立場，極難說動其爲晉方所用）。十一月一日，閻錫山收到山西駐南京代表劉楨轉來南桂馨之密電，南向閻報告：「昨有張作霖衛隊二營邢朝卿、倪安元來接洽」，「邢、倪皆係李芳宸（按：李景林字芳宸，爲前奉系將領，曾任直隸督辦。因見惡於張作霖，逃往南方，依附北伐軍）舊部，且係砲隊，馨等已囑伊等直向涿州晉軍接洽。彼等甚爲誠懇，接頭者係佟明義」。[148]十一月五日，閻又接南桂馨來電，謂「門頭溝奉軍擬調衛隊孫旅一旅拒守。除此外，即王琦部分係趙子明、張友桂兩團，該兩團馨等已與接洽，惟我軍前線不認旗語、符號，故未能聯絡，乞速令前線指揮官注意」。[149]十一月十一日，閻致電傅作義，謂「接南處長由津電稱：此間接洽之趙子明、劉福山、劉凱臣等部，已助我軍側擊涿州東面，曾與約定下列符號：單日用白旗或藍旗，雙日用紅旗，向北如上下動，即答以左右動，如左右動，即當以上下動。晚間用燈，不拘紅藍，動作同旗。又如

---

[145] 〈致永嘉堡商都統郭處長艷辰二參電〉（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發），同上，頁一一六。
[146] 以上兩電，見《涿州戰紀》，頁五〇〇。
[147] 〈復涿州傅師長統密歌戌電〉（十六年十一月五日發），《閻檔——參戰案》卷三，頁一四三。
[148] 〈南京劉楨忱元密世三電轉南處長元密勘電〉（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到），同上，頁一一五。
[149] 〈南京劉楨忱元密支電轉南處長元密世電〉（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到），同上，頁一二六。

臺灣期刊資料庫

用號音，則彼吹吃飯號，我吹起床號，彼吹起床號，我吹吃飯號。如當面接頭時，先向北說來人是朋友麼，則答以不是朋友，是同志。馨已派人隨同赴涿與我軍接洽等語。希俟派人到後，審愼接洽辦理可也」。[150]但不知何故，涿州城內晉軍對其所吹符音未有反應。十一月十七日，閻接南桂馨來電，謂「此間所接洽之趙子明、劉凱臣兩部，已助我側擊涿州東面後，即吹相約符音，我軍不應。彼等現退竇店，意欲拆壞盧溝橋。馨等已派人偕同該兩部代表人，向我軍接洽，速乞鈞座飛令前線各軍注意友軍符號，以免後方助戰之各軍灰心觀望，是爲至盼」。[151] 同日，閻接南桂馨另一來電，謂「劉偉所部十一軍全軍及蘇漢章、安錫嘏兩師（按：即第十七師、二十五師），均在涿州附近，派人來接頭，願全部一齊動作。惟願山西知道，能聯絡一致，不至失敗。據來人云：劉係郭茂宸（按：郭松齡字茂宸，爲前奉軍將領，民國十四年底起兵擬推倒張作霖，初勝後敗，被執槍決）舊人，張學良疑忌甚深，近來裝神經病，每夜十二鐘後，始與左右談一時清醒話，白天故裝茫然。近來彼輩已聯合一致，欲推戴麟閣（按：楊宇霆字鄰葛，亦作麟閣，曾任奉軍總參謀長、江蘇督辦，時任張作霖之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府府軍事處長），麟閣表示不叛張。經此拒絕，更形恐惶，故來接頭時先問晉軍有何聯絡方法，馨答以按此部份獨立作戰即可，早有表示，晉軍當然協助，不過，此事只要達知太原，不怕不協助你們。又問將來如何，馨等答以關外事歸你們自行解決，山西儘量幫助。又問名義，馨答以即以彼現在之十一軍上冠以北方國民革命軍兼東北方面總指揮。又問接濟，馨答以只要動作能與晉軍聯絡接上，當然接濟」。[152] 十一月十八日，閻電復南桂馨，謂「各部既有反奉接洽，一切均可優以許之，不必限於關外。再此事如有實現之可能，此間即誘敵深入，使各部有乘機動作之餘地也」。[153] 十一月下旬，南桂馨致電閻，謂「昨日劉（按：指劉偉）處接頭之人已歸，據云劉部三師在涿州附近，安、蘇兩師在涿州以南，對於攻涿，劉部已消極應付僞命，絕不積極進攻，只待機響

---

[150] 〈致涿縣傅師長統密眞戌電〉（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發），《閻檔——參戰案》卷三，頁一五六。

[151] 〈天津南佩蘭乙密篠電〉（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到），同上，頁一五八。

[152] 〈南京轉南佩蘭懷密佳電〉（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到），同上，頁一六八。

[153] 復南京轉南處長懷密巧電〉（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發），《閻檔——參戰案》卷三，頁一六八。

臺灣大學圖書館

應，確定兩點：（甲）如晉軍先到定州，彼等同時掛青天白日旗。（乙）如南軍先到濟南，亦可同時掛旗響應。至於第二步做法彼等能做至如何程度，請晉軍按其成續接濟，以符信義。現在奉軍內部猜忌甚深，張氏要撤換劉偉，但其部下三師長同意於我，彼之位置無甚關係」。[154] 十二月一日，南桂馨密電閻，謂「劉偉已取消軍長，但其部下屬舊安、蘇兩部已與馨訂有條件，其文如下：十六年十一月廿一日，山西三十一軍軍長王北平代表、南總代表，與現任鎮威軍（按：民國十一年、十三年兩次直奉戰爭，奉軍均用鎮威軍名稱）第十七師師長蘇漢章、二十五師師長安錫嘏訂立合作條件如下：（甲）南總代表方面稱甲，十七師、二十五師方面稱乙：（一）乙因願與晉軍合作，至必要時擔任聯合，乙方同志協助晉軍動作。（二）於南軍取得濟南時，奉軍必往援救，彼時乙方即相機懸掛革命旗幟，以表示與北方革命軍一致行動。（晉軍於乙方表明反奉後，對於軍實等項應有充分之補助。（三）以後乙部之動作完全聽甲方之指揮。以上各條均署名簽字。又口頭訂明：如京漢晉軍反攻至定州，當然一致行動。（乙）尹正齋者，原名義口，前與處過同事，彼在京東一帶有兩萬餘人，槍械有一萬二千餘枝，全係直奉戰爭時之直軍，有徐某供給，人尚未散，兵及各頭目公推劉君與晉方接頭，願編兩師，劉爲軍長，馨已承認彼爲三十三軍軍長。劉又與安部三個團長有密切關係，據云該三團長找尹數次，請求設法與晉軍接頭，希望改編三旅，與涿州晉軍策應，馨亦已應允。惟動作時期，約以晉軍何時反攻到石莊，彼等即同時響應，彼亦已承認，屆時請通知涿州」。[155] 十二月二十四日，南桂馨致電閻，謂「涿州城下蘇、安、黃三師，係屬劉（按：指劉偉）部，約一萬三千餘人，其他尚有兩師，存待機而動之心，前三師均甚積極，較有把握」，「至動作時期，約以二十日至一月內必發動」，「已告蘇之代表，令其積極準備，並許蘇爲三十四軍，安爲三十五軍」。[156] 以上是南桂馨運動涿州附近奉軍與晉方合作的經過大要，這些允爲內應的軍隊，均非奉軍主流，心懷不平，故容易爲晉方所拉攏。其合作誠意如何，尚待考驗，縱有誠意，亦在爲其將來打

---

[154] 〈天津南佩蘭宥電〉（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到），同上，頁一九一。
[155] 〈天津南佩蘭平密東電〉（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到），同上，頁二〇七。
[156] 〈吳淞轉來南處長廿四日電〉（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閻檔——參戰案》卷四，頁四六～四七。

臺灣大學圖書館資料庫

算。所謂「待機而動」，是要待晉軍反攻攻占定州，或南軍（北伐軍）北進攻占濟南時，才反戈響應，這對被圍困於涿州多日苦撐待援急如星火的傅軍而言，並無實質上的助益。其他經南桂馨運動而有回應或主動與晉方接頭的，尚有孫殿英（直魯軍第十四軍軍長，曾任大名鎮守使，南桂馨允任孫爲第四十七軍軍長）、王德明（即王北平，南委其爲京榆薊游擊司令兼第三十一軍軍長）、楊耀先（其舊部在吉林、黑龍江邊境，約三師之衆，南許以第三十二軍軍長兼吉黑方面總指揮名義）、袁振青（大名鎮守使）、榮臻（奉軍第十七軍軍長，李景林舊部）、胡毓坤（奉軍第十六軍軍長，李景林舊部）、鄭俊彥（孫傳芳所部安國軍第一方面軍團第十師師長）等。不是距涿州太遠，無足濟事，就是運動尚未臻成熟階段。奉軍以絕對優勢的兵力、火力，圍攻外援全然斷絕的涿州守城晉軍，當時《盛京日報》以「獅子搏兔之涿州戰局」爲標題來報導之。[157] 晉軍苦守涿州三個月，望眼欲穿之援軍始終不至，不得不考慮妥協之事。

(二)官兵傷亡日多，彈藥消耗將盡：

涿州晉軍堅苦守城三個月，奉軍七度攻城，戰況慘烈無比，奉軍傷亡甚大，晉軍亦付出相當代價。雙方傷亡到底多少，其精確數字因缺乏有力的資料，不得而知。民國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傅作義致電閻錫山，向其呈報敵軍圍城決當堅強固守，電文中謂「我乘勢反攻，並抽派部隊逆襲，敵頑強抵抗，終以傷亡過重潰散，我亦傷亡不少，不敢深追」。十月十七日，傅致電閻，呈報敵軍圍攻涿城情形，謂「職於眞日（按：即十月十一日）襲占涿州，敵圍攻甚烈，鐵道屢破屢修，並用飛機重砲攻城，我軍亦不時出擊。敵傷亡無算，我亦傷亡不少」。十月三十一日，又電閻，呈報敵軍第四次總攻並用燒夷彈焚城我仍固守待援，謂「敵我傷亡均甚多，我步兵營，有剩有百餘人者」。十一月二日，傅致電閻，呈報敵連日砲攻毀房頗多我傷亡甚衆等情形，謂「敵固傷亡甚衆，我亦傷亡三分之二」。[158]電文中所謂「我亦傷亡三分之二」，不知是指守城晉軍全軍的三分之二，還是指這幾日投入直接戰鬥

---

[157] 《盛京時報》，民國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一版。
[158] 以上各電文，見《涿州戰紀》，頁四九八～五〇〇。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晉軍部隊的三分之二？《涿州戰紀》記至十月二十八日，守城晉軍「旬日以來，激戰不息，傷亡頗甚，任戰之兵不及二千人」。又記至十一月十日，晉軍已堅守一個月，「原晉軍初入城，不過七千人耳，及是傷亡病困，殆逾太半，能戰之士，亦云僅矣」。十一月十七日奉軍展開第七次攻城時，守城晉軍除傷亡病困，約計官長士兵，不足三千人。至十二月十六日左右，晉軍傷兵約在一千五百人之數。又記守城晉軍「總計陣亡病故，官長五之一，士兵三之二」。[159] 以上傅作義向閻錫山呈報所部傷亡情形，及《涿州戰紀》所記傅軍傷亡人數，極可能誇大其辭。傅用意似在促使閻速派軍隊馳援解圍。《涿州戰紀》用意似在強調涿州攻防戰的慘烈，守城晉軍傷亡大半，爲日後開城妥協作合理的解釋。民國十七年一月中旬，守城晉軍出城後，南桂馨於一月二十五日致電閻錫山，謂「傅作義部運至通州者五千餘人，涿州尚有二千餘人」。[160] 北京之《益世報》亦載晉軍全數離涿州，總數約七千餘人。[161] 此一數字，恐不正確。據保守的估計，守城晉軍傷亡數字，約爲三千多人（死傷各占一半），接近全軍之半數，似較合理。至於彈葯方面，民國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傅作義在出發奇襲涿州前，與各部隊下動員準備完成之命令，規定各部隊攜帶的裝備，皆依輕裝規定。彈葯按一個半動員量攜帶之；衝鋒槍彈葯加倍攜帶。手擲彈、迫擊砲、步兵砲，均按一個動員量攜帶之。[162] 所謂一個動員量，一個半動員量，到底是多少，並無數字上的說明。但可以斷言，因係輕裝遠襲，所攜彈葯必然不是很多。十月十四日傅作義入涿州後，即致電閻錫山，呈報數日來激戰情形，謂「敵仍有包圍涿城之部署，我給養及彈葯，均有顧慮」。次日，又致電閻，謂「惟職自占領涿州，兵力彈葯俱極有限，給養尤感不足，常此以往，恐難爲繼」。十月二十二日，傅致電閻，謂「職部激戰多日，山迫曲各砲彈將盡，手擲彈戰鬥員平均每人不及一枚」。十一月二日，傅電閻，謂「彈糧將盡」。十一月六日之電：謂「搜集糧秣，收非戰鬥員彈葯，努力防備」。[163]傅作義曾親撰與各部隊誥誡士兵節省子彈之白

---

[159] 《涿州戰紀》，頁二〇二，二二七～二二八，二五二，三一二，及四四八。
[160] 〈天津南佩蘭平密廿五日電〉（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到），《閻檔——參戰案》卷四，頁九〇～九一。
[161] 《益世報（北京）》，民國十七年一月十四日，第二版。
[162] 《涿州戰紀》，頁五〇三。
[163] 以上各電，見同上，頁四九七～五〇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話諭文：「節省子彈，從前說過多少次。查現在還是有亂放的，我想起來，是很可怕的。你們閉上眼想想，我們帶的子彈是有限的，離省這們（麼?）遠，道路這麼難，補充實在不易。如將子彈亂放完了，憑著什麼打敵人呢?所以你們放槍的時候，務必要實行一彈打一敵人那句話。手擲彈是我們守城的利器，也是敵人最怕的東西，但是我們帶來的也是不多，如隨便亂擲，還用什麼來守城呵！大家的生命，誰又來保險呢?所以拋手擲彈的時候，心裏要先算算，要在近距離，一彈能打死多數敵人時，才可使用，切記切記」。[164] 事實上，至十月二十八日，守城晉軍手擲（榴）彈存量漸少，傅作義召集旅長、團長、參謀長密議，認爲應撙節使用，但不可使士兵知曉，減其銳氣，宜將全數集中營、連長手中，每名士兵身旁祇常存二枚，緊急時由營、連長增給之。此外，並以奪獲之炸葯製造鐵壺彈及地雷，以補手擲彈的不足。[165] 總之彈葯消耗將盡，官兵傷亡接近半數，守城晉軍勢難再戰。

(三)給養奇缺，糧食將盡：

尤其糧食問題，最爲嚴重。傅作義率部出發時，規定士兵每人攜帶糧秣三日份，棉外套一件，山鞋兩雙，水壺一個，子彈袋一條，各色臂章數份。[166]進入涿州城後，給養、糧食均日漸短缺，十一月十日，傅致電閻錫山，謂「涿城給養，刻已萬分困難，每日零星搜集，未嘗果腹。來時輕裝挺進，棉衣留置後方，現飢寒交迫」，「特恐食物羅掘盡時，則人人枵腹，難以致其力矣」。[167] 十二月七日，閻錫山接傅作義來電，謂「涿糧缺乏，曾由救急會居間放出人民二批，近民有餓斃及投井自縊者，有到衛戍司令部號泣者均甚多，兵士飢餓交迫，因下城投敵者亦有，擬請鈞座懸賞以維軍心」。[168] 若所述屬實，其情形已甚嚴重。另據參與涿州之戰的晉軍軍官鄭元庥回憶：

---

[164] 同上，頁五四二。
[165] 《涿州戰紀》，頁二〇三～二〇四。
[166] 同[162]
[167] 《涿州戰紀》，頁五〇一。
[168] 〈涿州傅師長進密虞寅電〉（十六年十二月七日到），《閻檔——參戰案》卷三，頁二一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晉軍由山西出發，部隊所需的給養，都是沿途向各商店購買。由河北蔚縣出發，到涿州的這段路徑，不但沒有商店，就是連個人影也很少見著。所以軍隊的食用，就不能不靠自己本身攜帶。但是運輸力有限，連接濟隊和士兵隨身攜帶乾糧，僅僅是五日份的。超過五日，就沒吃的了。就是騷擾老百姓。時在陽曆九月天氣，人沒吃的，就燒吃玉茭棒子，牲口沒吃的，就割餵老百姓的莜麥。到了涿州城，傅作義就和商務會成立起維持會來，軍隊的食用完全由維持會向城內商號及居民徵集供應。維持到兩個多月的時間，城內的糧食，已搜刮殆盡，傅作義不得已，就向城內各大酒店徵集酒糟，讓部隊吃。後來酒糟也吃的沒有了，眼看就到張巡守睢陽，羅雀掘鼠的境地。[169]

以酒糟代食，是十二月十二日，守城晉軍第四師參謀長陳炳謙所提議，陳並陳述以酒糟製餅之法，因未出酒之糟，味道酸澀，而出酒之糟，味淡而更澀。涿州城內糖肆中頗存有紅白各種糖霜，取以和糟，稍加麥粉，製之爲餅（其後麥粉用完，改以高粱及雜糧爲粉，各加少許代之）。十二月十三日，傅作義通令各部隊，依法製造酒糟餅呈驗，以餅味美惡，分別獎罰之。據曾身處圍城中的居民言：「晉軍苦戰經三月之久，不得宿飽，以食糟非人所堪，不數日而致浮腫之疾，以延喘息，且不可得，況以應敵?」十二月二十五日，城內「糟池又將垂盡」，且守軍「食糟十日，病者過半，其未病者，亦皆面色深墨」。[170] 戰鬥力已盡，難以爲繼了。

㈣ 各界（含奉方）的調停斡旋：

奉軍經過五次猛烈攻城，均無功而退，十一月四日，托天主教司鐸李德鏡入城調處，晉軍禮遇甚至，謝其居間調處之善意。李留三日而離去。[171]十一月六日，傅作義致電閻錫山，呈報李入城調處之事，謂「我虛與委蛇，含混以答，藉稽遲待援，並加固工事」。[172]此外在傅作義的指定下，奉軍特自北

[169] 鄭元庥〈回憶涿州之戰〉，《山西文史資料》第六輯，頁六九～七〇。
[170] 《涿州戰紀》，頁三〇一，三〇五～三〇六，三〇九～三一〇，及三一六。
[171] 同上，頁二一五～二一六
[172] 同上，頁五〇〇～五〇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京召來傅的保定軍校同學暨好友單益三，入城與傅晤談，傅請其轉致張學良三事：（一）在戰事未結束以前，所有由傅帶的山西軍隊，其一切服裝、餉項，均按奉方待遇負責發給，（二）將來戰事一有結局，如果閻錫山的軍權仍然存在，奉方應允許將原有部隊帶回山西歸閻指揮；（三）如果戰事結束，閻錫山的軍權已不復存在，其部隊即歸奉軍指揮。單返回保定向張學良復命，張對傅所提的條件，疾言痛罵。[173] 十二月十日，紅十字會會長前國務總理熊希齡派代表入城調處，傅作義令旅參謀長朱錫章專任禮待，及相機應付。次日，山西同鄉會代表入城。十二月十二日，前國務總理王士珍、前清史館總裁趙爾巽、前國務總理孫寶琦，各遣使以書至。是後代表調處，及遺書勸解者，繼續頻至，傅令朱錫章婉辭答復，或爲書報之，敦謝盛意而已。十二月十六日，涿州同鄉會代表入城，山西同鄉會代表續至。是後往還數次，皆由朱錫章接待之。[174] 十二月十七日各代表返抵北京後，其中一代表接受記者訪問，述說此行經過情形云：

> 余等七人（紅十字會人一，山西同鄉會四人，涿州代表一人，某軍官一人）赴涿州接洽和平，純是以慈善團體資格，十六日晚進城，十七日早出城。其接洽之情形，始終係以慈團代表口氣，出而央求。傅師長所提條件，雖有種種，而最要之點有三：（一）涿州城內二月以來，被晉軍征伐之款項，約有數萬，傅云此次出城，係以人民爲重，應由中央代爲清償；（二）部下尚有數千人，應請中央特別待遇，編爲國防軍；（三）此次出城，純以人民爲前提，一切儘可犧牲，聽由奉方主持，本人絕不過問。至於涿城之內，究竟先後供應多少，公益維持會有賬可查覆核便知等語。余等一方面囑維持會清算賬目，一方面出城到松林店，向萬（按：即萬福麟）軍長報告，萬亦有誠懇表示，但事屬中央權限，彼等不便有所主張。昨晚回京，即派人向張（按：即張學良）軍團長陳述，今日（按：即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二時，即向公府轉告。此行有軍事處王處長同伴，一切情形，府方業已洞悉，聞

---

[173] 單益三口述，劉茵依筆錄〈傅作義守涿州及解圍經過〉，《山西文史資料》第六輯，頁五九～六〇。

[174] 《涿州戰紀》，頁二九九～三〇〇，及三一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大元帥（按：即張作霖）對傅氏個人，極端愛惜，午後見著于楊兩次長（國翰續到）後，必有圓滿結果，預料明早今晚，須再赴涿州一次，此連日進行之概略也。[175]

其後至十二月底，各界的調處，已有具體的結果。

(五)涿州居民的央求：

當時涿州城內居民有三千戶，人口約三萬餘。[176] 此次身不由己，捲入晉奉涿州之戰，飽受戰禍的摧殘，最爲無辜，也至爲不幸。涿州之戰結束後，周存培在〈上大元帥請賑恤書〉中謂「本年十月十一日晉軍突入涿城，戰事發生竟歷三月，民疲食盡，流亡載途，室廬劫灰，城郭圮毀，商民交困，滿目瘡痍」，「戰後多日，人民之居於地窖無屋可栖者，十之八九，此民居被燬之情形也」，「民始則計口授食，尙獲一餐，繼則限制購糧，盡得半飽，甚至人食牛馬之食，迨牛馬之食既盡，則食釀酒之糟，百病叢生，死亡相繼，飢民號泣呼籲求賑於晉軍司令部者，動至千百，此人民乏食之情形也」。[177] 在慘烈的攻防戰中，「城外居民棄登場之穀，拋未穫之禾，挈彼妻孥，僅逃性命。城內住戶無處隱藏，均係洞處穴居，以避砲火，雖商民如此逃匿，而被流彈傷亡性命者，仍至百數十人之多」。[178] 十二月初，城內漸有和平聲浪。十二月四日晚，居民千百成群，齊向維持會請願，並跪在門首不起。[179] 十二月十三日，城中婦孺數百人，環繞晉軍師司令部，伏地號泣，請速罷戰。[180] 這對傅作義決定罷戰妥協，多少是有些影響的。

十二月十五日，傅作義召集第四師全部官長特別會議，連、排長下級軍官以酒糟不能久食，不問可知，請傅限一死守日期，傅許諾以十五日爲期。十二月二十五日，傅召集旅長、四位團長、兩位參謀長秘密會議，議定數事：（一）接洽某師響應，解圍後相機前進，直襲北京。（二）應居間調處之

---

[175] 《盛京時報》，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版。
[176] 《益世報（北京）》，民國十七年一月十三日，第二版，〈涿州圍城三月記〉。
[177] 見《涿縣志》，頁六六六～六六七。
[178] 同上，頁一四五。
[179] 同[176]。
[180] 《涿州戰紀》，頁三〇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議，請敵軍解圍，退兵若干里後，本師讓出涿城，自行退卻。（三）師長赴敵軍爲質，軍隊歸旅長指揮，相機應付達成全師退卻之目的。（四）第四師全體軍人，對於此後所處境地，無論困阨險阻至何程度，均宜堅固團結，俟時機一至，同心努力，奮起以竟全功。十二月二十六日，傅作義呈報閻錫山，師全體會議城食罄盡之最後決策。十二月二十九日，傅派遣第四旅參謀長朱錫章出城，至奉軍司令部，議請奉軍解圍退兵二十里，晉軍交出涿州城並守城各砲，引兵退卻。與議不合而歸。雙方共進行了三次談判，未能達成協議。[181] 十二月三十一日，閻錫山致電傅，謂「反攻猝難實行，涿城如果糧盡不能支持，即由該軍以全師官長相機處理可也」。[182] 民國十七年一月四日（已逾前此議決固守之期五日），傅作義召集全師官長特別會議，下令第四師全部由旅長白濡青率領，一切事宜，相機應付。並呈報閻錫山，城中食盡，師長傅作義親赴敵軍議和。一月六日，傅偕第四旅參謀長朱錫章、師司令部參謀金中和出城，赴保定議和。[183] 出城前傅親撰「與各部隊臨別訓話文」，訓勉師全部士兵，另撰有「臨別慰謝涿州全城父老子弟詞」，[184] 令參謀長陳炳謙，於其出城後代表其慰謝涿州城內全體居民。關於傅作義等出城議和的經過情形，萬國影片公司攝影員范濟時曾目擊之，其記述刊載於北京之英文《華北正報》，略謂：

> 多日包圍之涿州城，於今日（六日）下午二時解決。傅作義及其參謀事前未通知，即由西南門出城至奉軍前線，同時山西守城之軍隊列隊送傅氏及隨員出城。在前線之奉軍見傅氏到，均紛紛離開戰壕，並將鐵絲網取除，以便傅氏及參謀並著便服者二人通過。傅氏等均騎馬，出城後隨即赴涿州車站，萬福麟氏已在站等候，並伴同乘專車赴保定晤張學良。傅氏出城事前未經宣布，多爲稱奇。傅對安國軍司令行鞠躬禮，司令以軍禮報答，傅氏衣黑色長軍服，當傅氏入車站時，萬福

---

[181] 同上，頁三〇七～三〇九，三一五，三二〇～三二四。

[182] 〈致涿州傅師長進密世酉電〉（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閻檔——參戰案》卷四，頁四五。

[183] 《涿州戰紀》，頁三二八，三三四。惟其記傅作義等出城日期爲一月五日，恐有誤。當時天津、北京各報及傅出城前後所撰寫的文、詞、電報，均作一月六日。

[184] 此二篇文、詞之全文，見《涿州戰紀》，頁五四六～五四九。

> 麟之衛隊均向傅氏行立正禮。當開城五分鐘前，雙方軍隊尚在互相槍擊也。傅氏面色愉快，並無絲毫受餓或困乏之形狀。傅氏見范君在側，遂問予等（范自稱）爲何人，予答以自被圍起即在此，傅氏允予等爲之拍一立影，予同伴王君爲傅氏拍照，並告以昨日已在此相候，因安國軍昨派軍官一員到涿州，宣稱倘傅氏今日不降，當整隊再議也。[185]

稍後，晉軍第四旅旅長白濡青亦出城赴保定與議。傅作義在保定晤見張學良時，張先致慰問，坐定後傅謂「作義此來有先要求於總指揮者，涿州城中人不得食者已二日」，言尚未畢，張即交待萬福麟傳令前方，速給涿州城內軍民三日食物。傅起身答謝，張謂「兩家本一家，且同爲國事，願勿介介，遠來勞苦，賓館少休，軍事徐徐議之」。傅出示其通告國民文，請張代爲拍發，張允之。會晤畢，萬福麟送傅至賓館，即告別離去。[186] 據傅、張會晤時在場參與的單益三回憶：二人初見面，彼此均很客氣。後因傅對張說，他在城內的確是無辦法了，否則他尚不會出來做這樣之事。張聞言神色立變，面色蒼白，靜默片刻才恢復常態，勉強再周旋一下，就囑人將傅和白濡青送往北京面見張作霖。在傅動身前，張學良要單告知傅說：「他們到京見到大元帥，態度應放謙虛一點，不要再說已說過的那些話。說話委婉些有好處，以免叫脾氣不好的大元帥對他們下不去」。[187] 一月八日，傅作義、白濡青在奉軍第三、四方面軍團部參謀長鮑文樾陪同下，自保定乘專車（火車）出發，至松林店晤萬福麟後，乘車繼續前進，次日，抵達北京，晉見張作霖。[188] 張一見傅、白二人，先伸出大姆指說：「你們很好，很好！」話畢，即命其參謀長于國翰給傅，白每人一萬元，作爲酬酢之用。傅在北京停留短短幾天，即由奉方派員送往保定，無形中予以監視起來。[189]

城內晉軍方面，奉方決定改編爲陸軍第三十六師，一月十日，奉方第

---

[185] 轉見自《大公報（天津）》，民國十七年一月八日，第二版。
[186] 《涿州戰紀》，頁三四六－三四七。
[187] 單益三口述、劉茵依筆記〈傅作義守涿州及解圍經過〉，《山西文史資料》第六輯，頁六一。
[188] 參見《大公報（天津）》，民國十七年一月八日，一月十日及一月十一日，第二版。
[189] 同[187]。頁六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四方面軍團軍團長張學良、韓麟春任命白濡青爲師長，白未到任以前，由團長（第三十六團）袁慶曾代理。[190] 一月十一日，在保定之張學良、傅作義，以及在松林店之萬福麟，議定妥協條件：（一）奉軍對於城內晉軍，須發給十五萬元。（二）晉軍全部解除武裝後，須先使人員乘列車開往通州方面。（三）軍械則彙集一處，全部運往通州後，再分交晉軍各自之手。（四）晉軍雖移駐通州，而其改編狀態，須照從前編制。（五）晉軍今後改稱國防軍，絕對不參加內戰。（六）晉軍今後完全直屬中央。[191] 一月十二日，涿州晉軍全部出城，據萬國影片公司攝影員范濟時之〈涿州通信〉記稱：

> 涿州事件，今日已算完全解決。晉軍兵士將槍械交給奉軍後，遂由南門出城赴車站，並未發生事故，上車後即將載往通州，由奉軍改編，兵士等均面露喜容，其年青者則頗現困狀。城內居民對晉軍均無惡感，晉軍出城後，居民即紛紛上街，所有戰壕內之木料，均被拆毀作燃料，兒童亦群集城上，收集木材，小錢舖亦忙碌一時，爲晉軍兌鈔票。晉軍出城時，城內並無搶掠，各地現由城內警察駐守。[192]

出城之晉軍數目，各報所載不一，有作八千餘人，有作七千餘人者，《大公報（天津）》的報導似較平實、合理，謂「傳說雖有五千，實際不過三千餘人，槍枝尚不滿三千，每槍平均有彈十餘發」。[193] 一月二十九日，閻錫山接南桂馨來電，謂「涿州傅部已移通州，傅表示不幹，已交待白濡青，白亦不承認，現由袁團長維持。槍械原定不交，但現在均徒手運通，恐難符原議」。[194]至二、三月間，奉方將通州晉軍撥歸吳俊陞（黑龍江省督辦），帶往黑龍江，在此之前，晉軍官兵有自通州開溜輾轉返回山西者，據身歷其境的鄭元庥記云：

---

[190] 《北京益世報》，民國十七年一月十四日，第二版。
[191] 《盛京時報》，民國十一年一月十五日，第二版。
[192] 《大公報（天津）》，民國十七年一月十五日，第三版。
[193] 同上，民國十七年一月十二日，第二版。
[194] 〈南京南佩蘭平密號電〉（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到），《閻檔——參戰案》卷四，頁八一。

臺灣期刊雲 近代期刊資料庫

臘月二十三日的那天（按：即陽曆民國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我們的部隊開到了通州城，步兵、工兵均駐在城裏，唯有我們炮兵駐在城外東關和南關。由涿州出發的時候，大炮及槍械已留在涿州未帶。到了通州不幾天，奉軍先繳了騾子，後來又要走了直魯豫籍士兵，僅剩下山西籍的士兵。忽于一九二八年陰曆的正月十六日（按：陽曆爲二月七日）由北京開來了奉軍，到通州城把四門一把守，就到晉軍駐的營盤裏，把所有的人一下子收拾起來，讓坐上火車運到"溝幫子"去。當我們到了通州，各個官兵每人都發了兩個多月的餉（應當是發三個月的），留了一部分錢，傳作義帶上到保定去見張學良，作爲應酬開支使用），于是各人都做好便衣，準備消息不好，就溜走。奉軍在城內搜查散兵，消息傳到城外，我們馬上換上便衣同我的同事鄭陸甫（他是少尉排長）雇了兩個毛驢，徑往北京而去。當天下午在前門東站買上票，到了第二天就到了順德府（邢台縣）。由邢台雇了單轅小車，經河南省的武安、涉陽、林縣的轄境，進了山西的東陽關到了長治。聽人說太原閻錫山貼出布告，收容由涿州回來第四師的人，並且還發欠餉六個月，每人升一級。于是我別了鄭陸甫，經沁州、沁源等地回了我的家鄉靈石。在家小住數日，即到太原報到。[196]

有的是至天津或北京後，經山西駐津代表南桂馨資助返回山西的，如三月十六日，閻錫山接南來電，謂「現有趙團長（按：即第八團團長趙錦彪）等八人來京，馨已給資令其速歸。此間留一、二人，招呼逐漸來者陸續歸省。[196] 三月二十七日，閻又接南來電，謂「現已由馨處遣歸官長四十餘人，兵士五十餘名，現仍陸續找尋遣歸」。[197] 有的晉軍官兵自通州南下，經由上海、南京、漢口返回山西。如三月二十日，閻錫山接山西駐南京代表吳華廉、劉棫來電，謂「涿州來京官兵，除由此間招待外，並酌發由滬至會興鎮旅費，計官長五十元，士兵二十元」。[198] 三月二十八日，閻致電山西駐漢口代表，謂

---

[196] 鄭元庥〈回憶涿州之戰〉，《山西文史資料》第六輯，頁七〇～七一。
[196] 〈天津南佩蘭平密蒸電〉（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到）《閻檔——參戰案》卷四，頁一三四。
[197] 〈天津南佩蘭平密養電〉（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到），同上，頁一三六。
[198] 〈南京吳代表等庥密皓二電〉（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到），同上，頁一三五。

「第四師官佐士兵由寧回省，已電駐京代表發給全路旅費，到漢時即由該處給予車票，並照料一切可也。」[199]

至於傅作義，自民國十七年一月上旬至保定，居住於亦爲保定軍校畢業時任奉軍第三、四方面軍團參謀長的鮑文樾家中，形同被監禁。至同年五月初，鮑文樾等對傅的防範逐漸鬆弛，傅由友人侯少白等策劃，在同鄉崔正春（笑如）和河北大學醫科學生段伯宇的協助下，化裝成商人，三人騎自行車出保定城，再乘坐大車（馬車）繼續前進，至白溝河鎮，傅、崔二人轉搭長途汽車而去。[200] 傅逃離保定後，即寓居天津租界，五月二十日，閻錫山接傅密電，謂「職乘監視鮑文齋赴保之隙，潛行來津，已由南處長電稟。涿戰喪師辱命，慙憤交集，值此積極北進之秋，謹隨南處長之後，努力工作，以俟會師京津，即當赴轅請罪。白旅長因有眷屬之累，未克同行，曾經函囑其潛匿民家，此時想已歸去矣」。[201] 閻當日即電復傅：「執事脫險到津，聞之欣慰，希努力工作，相見不遠也」。[202] 同年六月八日，晉軍（時已改稱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入北京，閻錫山在保定就任京津衛戍總司令，以張蔭梧爲北京警備司令，傅作義爲天津警備司令。六月十二日，張宗昌、褚玉璞之直魯軍退出天津，傅作義即於是日就天津警備司令職，得以東山再起，出任新職。

以上是涿州之戰守城晉軍的善後情形。關於涿州城內居民方面，民國十七年一月九日，賑糧開始入城，是日運進十車，約八十石。一月十日十五車，約一百二十石，一月十一日上午又運進十五車，前後共計三百餘石。城內人民時僅有一萬五、六千人，每日有小米六十石即可。保定亦已運往小米五百袋。故糧食暫時無虞，所缺者惟鹽與煤，城內斷鹽已近一個半月，一月十日，始運入二十斤，燃料無著，則拆屋引火。災民情況，城內紅十字會收容婦孺約五百人，病者三百，已死者二百。城內金融，硬幣極少，所用以流通者，一爲銅元票及維持會所發之流通券兩種，每種約有六萬元，通行城

---

[199] 〈致漢口梅勳彝頤密勘戍電〉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發），《閻檔——參戰案》卷四，頁一四〇。

[200] 關於傅作義逃離保定的詳細經過，可見段伯宇〈傅作義先生保定脫險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九十二輯（一九八四年一月），頁六五～六九。

[201] 〈天津傅宜生續沃密皓電〉（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到），《閻檔——參戰案》卷四，頁一四五。

[202] 〈復天津傅宜生續沃密號戍電〉，（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發），同上。

內。[203] 其後糧食、用品以及各界、各團體的捐助，源源而至，善後事宜，已著著進行。值得記述的是在涿州之戰期間，晉軍共欠城內商民一四三三〇〇餘元，民國十七年六月傅作義出任天津警備司令，他未曾食言，設法還債。據說他在天津罰了販賣大煙的投機商，將款匯到北京一家銀號裏，匯到次日，正遇上該銀號倒閉，傅派軍隊將銀號包圍，以武力強行將款索出。爲了感謝傅言而有信，涿縣（州）人民在北門瓮城北邊（即三義宮）爲傅修建一座生祠，題名「傅公祠」，且刻碑以記，撰文及書寫由涿縣名流周存培爲之。該祠堂至一九五八年尙存在，「大躍進」時即不見了。[204]

最後要討論的是晉奉涿州之戰的影響，可分幾方面來析論：

(一)對政局的影響：

涿州之戰是晉奉戰爭中的一環，晉奉戰爭則是整個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中的一部分，其連鎖、互動的關係，不言可喻。就戰略方面而言，涿州晉軍守城三月，圍攻的奉軍增至五萬餘人，這五萬餘軍隊被牽制於涿州一隅之地，使奉軍不能傾其全力進占山西，解決晉閻，也無法分兵進援在河南省與馮玉祥激戰的直魯軍，更遑論大舉南下進攻正爲內部問題所苦的南京國民政府。就心理方面而言，涿州因地處京漢鐵路線上要衝，距北京僅一百餘里，其動靜備受各方矚目，當時各大報紙都競相報導涿州的戰情，幾乎無日不有，致涿州之戰不僅爲一場武力競逐的城池攻防戰，同時也是一場攸關國民革命軍與奉方顏面之戰。奉軍以近十倍於守城晉軍之衆，挾優勢的裝備，極其充裕的糧彈，圍攻孤立無援飢寒交迫的晉軍，竟然久攻不下，而且傷亡慘重，面對全國輿論，其顏面盡失（其後晉軍繳槍出城，奉方算是挽回些許顏面），這對奉張心理上的打擊甚大。奉方爲達克城目的，不惜違反國際公法，使用毒瓦斯彈，經各報刊載，閻錫山及南京方面通電指責，對奉軍、奉方形象頗形不利。此外，晉軍堅守涿州，達三月之久，有如一柄利劍，直指奉方心臟部位，予奉方心理上以莫大之威脅。奉方因有此心腹之患，一切行事，均感束手束腳，不能全力以赴。就時效方面而言，晉軍堅守涿州，前後共三

[203] 《大公報（天津）》，民國十七年一月十二日，第二版。
[204] 賈廷魁〈被困涿州的回憶〉，《保定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頁一九二。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個月，這三個月是南京國民政府備極艱苦的時期，先是民國十六年十月的討唐（唐生智）戰役，接著十一月的「第一次廣州事變」、「南京一一·二二慘案」、十二月的「第二次廣州事變」（亦稱廣州暴動或廣州起義）等，南京國府致力於解決內部問題。這三個月對其至爲重要，經過一番整合，內部漸趨穩定，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堅持異議的汪精衛自上海啓程前往法國，次年一月四日，下野已四月有餘的蔣中正自上海到南京，一月九日，通電繼續行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領導中樞重新建立，準備大舉出師北伐。馮玉祥之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亦把握此三個月的寶貴時光傾力與直魯軍在河南境內大戰，卒於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下旬連番擊敗之，並沿隴海路東進，於十二月中旬攻占江蘇北部的蕭縣，及進抵徐州城下。直魯軍節節敗退，對於奉方坐視不救頗有怨言，導致彼此之間貌合神離。民國十七年一月，馮部已進至直隸、山東境內。同年二、三月，山西方面的晉軍展開反攻，三月三十一日，蔣中正自南京赴徐州，督師北伐，奉方的處境，岌岌可危，其覆敗已可預期。

(二)對晉方的影響：

如前所述，由於涿州晉軍牽制住五萬餘奉軍，及其對奉方心理上所造成的威脅，使奉方不能全力進攻山西，解決晉閻（惟不宜太過強調涿州之戰對山西戰場的貢獻，致生誤解，以爲奉軍進攻山西無法得手，全係涿州守軍牽制奉方之功，而忽略其它的原因，如山西的地形，易守難攻；奉軍深入山西，戰線延伸，後方接濟不易，以及直魯軍在河南敗退，馮玉祥率部次第東進北上，予奉方相當的壓力等等）。此外，涿州晉軍守城三月不失，予晉軍精神上莫大的鼓舞，有助於提升晉軍因節節敗退而低靡不振的士氣。同時也讓國人感覺晉奉戰爭晉軍初勝後敗，敗得雖慘，但似乎又未全敗，涿州不失，其象徵性的作用，亦不在小。又當晉奉戰爭晉軍初敗時，閻錫山如當機立斷，立即電令甫入涿州的晉軍第四師傅作義所部火速退卻，並派軍趨前接應，傅軍未嘗沒有機會能夠全師退返山西。閻似乎有意遷延再三，遲遲未下涿州傅軍速退之電令，亦未派軍接應，且含混其詞，不使傅軍知悉晉軍節節敗退實情，造成稍後傅軍退無可退，祇有背城一戰，死守待援的局面。這極可能是閻的一著險棋，失敗，則不過損失此七千餘人之傅軍，成功，則能發

揮奇效，閻深知傅作義能征善守，或能不辱使命。再者，晉軍本無赫赫之名，民國十六年閻錫山通電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軍總司令，晉軍始爲人所注意，此次傅作義守涿州，震盪中外，晉軍因而名噪一時。[205] 身爲晉方領袖、晉軍總司令的閻錫山，更與有榮焉，對其讚美、欽佩的言詞、文字，迭相而至。尤其是晉閻建此殊勳，深爲南京國民政府所器重，南京國府在給晉方的嘉勉文中云：

> 三晉軍興，九邊聲震，主帥以智勇名，將士以堅強勝。用是中樞之大計，得以密慮周詳，南服之友軍，亦得從容進展。涿州固守經月餘旬，彌見聲威，立功殊偉。檀道齊有長城之譽，岳家軍比撼山之難。遠望幷門，良深嘉慰。[206]

民國十七年二月，國府任命閻爲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與蔣中正（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馮玉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並列爲國軍四巨頭，同年六月，更因爲負責接收並衛戍北京、天津，而成爲北方之重寄所在。

㈢對傅作義的影響：

傅爲晉奉涿州之戰的焦點人物，其姓名本鮮爲外界所知。涿州之戰初期，京、津各大報紙，由於消息隔絕，或傅名不見經傳，而報導守城晉軍將領爲傅存懷（另一位晉軍將領）者（如民國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之天津《大公報》載稱），其後又載其爲「傅存義」，至十二月中旬才載其爲「傅作義」。十七年一月上旬，《大公報》且刊出傅之照片，註文爲「問題人物之傅作義」。[207]《盛京時報》之照片註文爲「義勇歌於一時之傅作義將軍」。[208]天津之《國聞週報》第五卷第二期（民國十七年一月八日出版），則以其爲該期人

---

[205] 郭榮生〈晉綏軍史稿〉，《山西文獻》第十期（民國六十六年），頁一五。
[206] 文載《涿州戰紀》，頁四八一。
[207] 《大公報（天津）》，民國十七年一月五日，第二版。
[208] 《盛京時報》，民國十七年一月八日，第二版。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物，附其照片專頁予以介紹。[209] 自此，傅名動一時，成爲各界交相讚譽的英雄人物。北方著名的文士樊增祥（字樊山，清末曾任直隸布政使，與南方名士羅惇曧齊名，人稱「南羅北樊」）曾爲詩讚美傅作義云：「新收涿鹿七千人，百日燕南立大功。十六年來千百戰，英雄我愛傅將軍」。傅頌一時，更具有錦上添花的作用。南京國民政府對於傅的卓越指揮及守城晉軍的英勇表現，也多有所推崇，如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國府密電閻錫山，謂「逆奉圍涿，阻我義師，鞭弭周旋，時逾兩月，堅守孤城，無懈可乘，雖田單之守即墨，眞卿之守常山，何以過之？更非執事有勇知方，曷克臻此?」[210] 十二月二十七日，南京國府開第二十七次委員會議，決議任徐永昌、傅作義、劉驥爲國府軍事委員會委員。[211] 次日，由國府明令發表。[212]國府常務委員李烈鈞於同日致電閻錫山，謂「傅師長作義堅守涿州，名震中外，此固由於上下一心，軍民同德所致，而傅師長堅苦卓絕，實屬難能。昨日已奉政府令，派爲軍事委員會委員，徐總指揮永昌，劉總指揮驥，皆同時奉派。在各將領敝屣榮名，然中樞有功必紀，正藉共資籌策也，請轉達遵照爲荷」。[213] 十二月三十一日，閻電復李，謂「傅師長蒙中央破格拔擢，亦我兄垂青游揚之力，已轉電該師長努力圖報矣」。[214] 此爲傅一大殊榮，誠如山西駐南京代表劉棫在致閻電報中所言：「以師（按：指師長）任委員，傅其創例也」。[215]此外，傅作義因涿州之戰的英勇表現，以致「熱情豪放，浪漫狂爽」的少帥張學良，[216]於傅有不打不相識，英雄惜英雄之慨，傅在保定居住的三、四個月中，結識不少張學良的部下和幕僚（奉軍將校中尚有一些傅原就認識的保定軍校同學）。有此淵源，在晉軍將領中傅與東北軍（原奉軍）的關係是比較好的。民國十九年冬中原大戰結束及其以後的一年中，張學良以中華民國陸

---

[209] 《國聞週報》五卷二期（民國十七年一月八日），〈時人彙誌〉。
[210] 〈南京國民政府靜密元電〉（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到），《閻檔——參戰案》卷四，頁一三。
[211] 《申報》，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二張，〈國內要聞〉。
[212] 令文見《國民政府公報》（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民五十七年）第十九期，〈令〉，頁三。
[213] 〈南京李協和戳午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閻檔——參戰案》卷四，頁四〇。
[214] 〈復南京李協和靜密世申電〉（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同上。
[215] 〈南京劉樸忱雲密沁二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同上，頁三三。
[216] 此爲張學良自述其個性之字句，見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轉見於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金仲達出版，Evergreen Publishing Co. 發行，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1986），頁三八一。

臺灣大學圖書館

海空軍副司令（總司令爲蔣中正），主持北方軍政，民國二十年八月，南京國府會議決議任傅作義代理綏遠省政府主席（年底眞除），傅能從晉軍諸多將領中脫穎而出，膺任一省之方面大員，此與上述傅與張及其東北軍的淵源，或多或少是有所關連的。

五、結　論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十月至十七年（一九二八）一月的涿州之戰，是晉奉戰爭的一環，而晉奉戰爭係整個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的一部分，三者的關連性顯而易見。就歷史的背景而言，晉奉戰爭的發動者閻錫山，原爲革命党人同盟會會員，清末在山西新軍中任職，武昌起義後，山西革命党人起而響應，宣布獨立，閻錫山被推爲山西軍政府都督，從此掌握山西省軍政大權長達三十餘年，人稱「山西王」。惟閻雖爲革命党人，民國初期處於北京政府就近的統治，以及山西四周北洋軍閥勢力環伺的壓力下，爲求自保，乃採取閉關自守與現實妥協的策略。其爲人沉穩圓滑，加以山西山河峙帶，易守難攻，閻遂能於民初十餘年間保有山西不失。及至民國十五年北伐軍興，南北政局益形複雜多變，山西欲圖自保，越來越難，於是一向持「門羅主義」的閻錫山，毅然於民國十六年六月易幟，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軍總司令，自此擺脫以往地方軍閥的形象，惟仍與主宰北京政府在北方勢力最大的奉系軍閥維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雙方信使往還，時有所聞。

民國十六年九月，奉系陣營準備大舉進攻河南，以謀澈底解決與奉張（張作霖）有宿仇的馮玉祥及其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此一態勢使與馮同屬革命陣營且甫盡釋前嫌的晉閻大爲恐慌，如馮被解決，山西將唇亡齒寒，更無迴旋之地，故聯馮以拒張，當較與奉方合作爲得計。且閻深知奉張對其種種陽奉陰違的作爲蓄怒已久，終有爆發的一日，與其待其來攻，不如先發制人。何況奉方內部意見不一，主戰派與主和派傾軋互鬥，力量勢難總體發揮，反觀山西近年來積極擴軍，兵力已逾二十萬人，未嘗不可一戰。加以山西自易幟以來，革命情緒高漲，閻認爲將士齊心，民氣可用。以上所述，是爲閻敢於主動發動晉奉戰爭的主要原因。雖謂主動，亦情勢所逼，不得不爾。晉奉戰爭爆發後，奉方因事出其意料之外，猝不及防，而節節敗退。然

好景不長，數日之後，奉方大舉反撲，形勢即告逆轉。就整體實力而言，此次毫無外援的晉閻終難與奉張匹敵，晉軍本身又缺乏實戰經驗，加以擴軍過速，訓練有所不足，作戰指揮權未能統一，各路軍隊聯絡不上，兵力的部署亦不當，以致晉軍左右兩路，同遭敗績，退回山西，依山作戰，憑險而守。

就整個戰爭的過程來看，晉方先勝後敗，敗得很慘，晉軍在戰爭中的表現幾乎乏善可陳，唯一值得大書特書的只有涿州之戰了。涿州（即涿縣）爲古幽州地，屬直隸省所轄，其縣治在北京西南一百四十華里處，有京漢鐵路過境，地位極爲重要。國民革命軍方面最早提出攻取涿州主張的，似爲其蘇俄軍事顧問團長加倫將軍，但未見實行，閻錫山發動晉奉戰爭以一支奇兵襲取涿州，其靈感或係得自加倫的主張。閻原來襲取涿州的構想是爲了配合晉軍主力左右兩路的攻勢，是攻擊性的，積極性的，最終目的是欲以此支奇兵橫斷京漢鐵路，相機進據北京，一舉傾覆奉張。負責奇襲涿州此一重任的是晉軍第四師師長陸軍中將傅作義。傅畢業於保定軍校步兵科，是晉軍傑出的青年將校，曾於民國十五年夏秋國（馮玉祥之國民軍）晉戰爭中率所部晉軍第八團死守雁北的天鎮縣城三月有餘，有極爲出色的表現，此次閻派其擔當極其重要而艱鉅的奇襲任務，信非偶然。傅受命後，率所部第四師自山西輕裝出發，跋山涉水，穿越荒野，直趨涿州，在奉方全然不知毫無戒備的情況下，一舉襲占涿州。詎料，晉軍主力左右兩路已全面敗潰，退回山西，奇襲涿州成功的晉軍第四師竟成爲深懸敵後的一支孤軍，旋在奉方大軍的重重包圍下，進退不得，唯有堅守以待，慘烈無比的涿州攻防戰就此展開。

涿州攻防戰前後歷時約三個月，奉方調集兵力逾五萬人，益以優勢的裝備，前後七度圍攻涿州縣城，用盡各種方法，出動飛機、坦克車助攻，挖掘地道，發射燒夷彈、毒瓦斯彈等，均無法得逞。守城晉軍僅七千餘人，且屬輕裝部隊，能夠一一擊退奉軍七度的總攻擊，其原因一由於涿州城高而堅固，以當時奉軍砲火的威力，難以一舉轟坍整片城牆令其步兵蜂擁衝入城內決戰。二由於晉軍攜有不少山西兵工廠特製的守城利器－手擲彈，其破片多，容易炸，居高臨下而擲，殺傷力尤大。三由於傅作義卓越的領導，其堅忍狠勇的個性，豐富的軍事知識，又有實戰的守城經驗（死守天鎮成功的經驗，應對其有極大的助益），治軍賞罰嚴明，指揮若定，更能激勵官兵士氣，使涿州之戰成爲民國軍事史上守城之役的典範。奉軍經過七次的總攻，均無

功而退，而且傷亡甚衆，乃在涿州城外四周挖掘深壕，深壕之外，置電網地雷，作長久圍困城內晉軍之計。最後涿州晉軍一由於望眼欲穿的外援已全然斷絕，二由於官兵傷亡日多，彈葯消耗將盡；三由於給養奇缺，糧食罄盡；四由於各界的調停斡旋；五由於涿州城內居民的懇請央求；傅作義乃同意與奉方談判，雙方達成協議，晉軍出城，接受改編，傅作義移居保定，慘烈無比的涿州之戰，遂告結束。

至於涿州之戰的影響，可分爲三方面言之。其一是對政局的影響：涿州之戰，歷時三個月，奉方投入涿州戰場的兵力逾五萬人，致其無法全力以赴於其他戰場（如山西、河南），以及大舉南下進攻正爲內部問題紛擾所苦的南京國民政府，使南京方面得以從容專事整合內部，重建領導中樞，爲日後的繼續北伐統一全國奠下基礎。此外因涿州密邇北京，涿州晉軍的屹立存在，予奉方心理上的威脅極大，有此心腹之患未除，其一切行事均感束手束腳，多所顧慮。其二是對晉方的影響：如前所述，晉軍的屹立存在，使奉方不能傾其全力進攻山西，同時也有助於提升晉軍因節節敗退而低靡不振的士氣。此外晉軍本無赫赫之名，因涿州之戰，震盪中外，輿論界始對其刮目相看。身爲晉方領袖、晉軍總司令的閻錫山更與有榮焉，獲得各方的讚譽。尤其是晉軍建此殊勳，身受其惠的南京國民政府對閻益爲倚重，民國十七年二月，國府任命其閻爲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與蔣中正、馮玉祥、李宗仁並列爲國軍四巨頭，同年六月，更因爲負責接收並衛戍北京（北平）、天津，而成爲北方之重寄所在。其三是對傅作義的影響：傅爲晉奉涿州之戰的焦點人物，其姓名本鮮爲外界所知，因涿州之戰，名動一時，成爲各方交相讚譽的英雄人物，南京國府更於民國十六年十二月「破格」任命其爲國民政府委員。奉方的「少帥」張學良，亦對傅的英勇表現極其賞識，民國十九年冬，張學良以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主持北方軍政，翌年國民政府即尊重張意任命傅爲綏遠省政府主席，傅遂能以未及「不惑」之年（三十七歲）成爲掌控一省之方面大員。

最後要討論的是涿州之戰傅作義的評價問題。一般而言，世人對於傅在涿州之戰中的表現幾乎是一致推崇讚美的，祇有極其少數的人，宥於傳統觀念或立場不同，對傅最後力戰而屈「爲德不卒」感到遺憾。蓋中國的傳統觀念，較重視精神道德層面，軍人如講求忠義，乃至殺身成仁，往往爲史家或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輿論所稱頌。西方的觀念，較重視現實效用，軍人如力屈被俘，往往被認爲已克盡職守，留得此有用之身，再圖將來。是故其在戰爭中被俘的官兵，當其被釋歸來時，往往受到英雄般的熱切歡迎，反觀中國戰俘的際遇，便迥然不同。此中國軍人何其「不幸」？中西價值觀本有不同，「武德」的準則自然也有所差異。用之責難傅作義，雖稍嫌嚴苛，卻也並非無的放矢。傅在與奉方進行談判時已慮及於此，曾倣效三國時代關羽「降漢不降曹」的忠義舉措，與奉方達成協議：晉軍出城，改稱國防軍，直屬於中央（北京政府），永不參加任何內戰，惟奉方事後並未遵守此一協定。至於因立場的不同而責難傅，台灣中華民國官方編著的《北伐戰史》書中的一段話可爲其代表：「誠盡防守之能事，倘能奮鬥到底，繼續予敵以牽制消耗，則我或可有反攻之機會（按：根本無此可能性），不然，則至死不屈，取義成仁，亦將在革命北伐史上，永垂竹帛，卓著勳烈，乃中道變志屈節，退出名城，反美其名曰和平，大陸戡亂中三十七年奸匪威迫平津時，傅又在和平僞裝下，變志屈節，城下訂盟，此種屈辱行動，誠亦重襲舊案，再演其慣技，誠可痛也」。[217] 不僅官方如此，與官方格格不入的史學家沈雲龍，在其重印《涿州戰紀》予以出版的說明一文中亦有類似的看法：「傅既以此役成名，雖歷經二十年來內外諸動亂，其名位始終扶搖直上。大陸淪陷前，且坐鎮北平，負責華北剿匪之重責，受最高當局特達之知，倚畀不爲不深，最後傅效涿州之故智，開門降匪，不惜自毀其歷史而靦顏以求生，貽羞千古，可慨也夫」。[218]（按：中國大陸官方或史學界的看法，便截然不同）。

就傅作義本人的感受而言，儘管涿州之戰，一舉揚名，但是，他還是認爲那是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戰爭，縱然有國民革命之名，認眞說來並不能算是十分光榮的事。倒是後來的長城戰役、百靈廟之捷與五原之役，由於槍口是對準侵略成性的日僞軍，因此多年之後，重行提及，猶令他深有光榮、驕傲之感。[219] 這種胸懷心志，是令人欽敬的。如果能拋開狹隘的政治立場，以較寬容的態度去看傅作義，其爲民國史上屈指可數的名將，是絕對符實而當之無愧的。

---

[217] 國防部史政局《北伐戰史》，頁九八〇。
[218] 夏壽田《涿州戰紀》，書前〈景印涿州戰紀說明〉。
[219] 龔選舞《國共戰爭見聞錄——龔選舞回憶（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民國八十四年），頁五二。

臺灣大學 期刊資料庫